

# 一個旅行的現代病

## ——「心的疾病」、科學術語與新感覺派

彭小妍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穆時英於一九三三年發表短篇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文中使用了大量的科學術語。醫學或心理學詞彙，如「女性嫌惡症」、「解剖」、「神經衰弱症」、「消化不良」等等，充斥全篇。如同典型的新感覺派小說，這些轉借自日文翻譯西方科學詞彙的術語，大肆嘲弄敘事者為追求摩登女郎而神魂顛倒，詼諧有趣。本文將指出：這些來自現代日本科學術語的轉借字，不僅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詞彙，也使言談、報紙、教科書等日常生活語言產生蛻變。這些詞語制約了我們對自己身體、心靈和外在事物的理解。我們日常使用的轉借字，無論科學或非科學用語，都已經大量地根植在我們的意識或下意識中，以致於很難察覺這些術語到底是不是「中文」。劉禾在《跨語境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一書中指出：附於她書後的轉借字列表是無法窮盡的<sup>1</sup>。事實上，即使一本轉借字詞典嘗試全面性地收錄所有詞彙，也不可能完全列出我們每天所使用的轉借字。轉借字已經改變了我們對感覺的描述，以及對自我、人際關係和世界觀的認知。

---

本文寫作期間，感謝黃意倫、鄭艷青在臺北、北京兩地協助蒐集資料。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提供善本書，哈佛大學館際合作，日本國會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數位化等服務，謹此致謝。

<sup>1</sup> 關於轉借字研究，我們都受惠於馬西尼。請參見 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亦請參考 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60-261。近來有關來自日本的轉借字研究，見 Juliette Yueh-tsen Chung, “Eugenics and the Coinage of Scientific Terminology in Meiji Japan and China,” in *Late Qing China and Meiji Japan: Political & Cultural Aspects*, ed. Joshua A. Fogel (Norwalk: EastBridge, 2004)。

本文將追溯心理學如何進入日本與中國成爲一門學科，並且以幾個關鍵詞彙的翻譯爲例，指出我們如何透過這些辭彙的翻譯，來學習爲我們的感覺和精神疾病命名。晚清以降，「東亞病夫」一詞盛行於中國<sup>2</sup>。到了二、三〇年代，許多作家開始告訴我們，中國人現在患了「心的疾病」，深受其苦。這是我們所面臨的一種現代病，是伴隨現代性、男女關係丕變、內戰連連、列強侵略而來的疾病。

結論時將說明：不只是科學詞彙，連「我愛你」這麼簡單的辭彙，也是現代的發明。同性或異性間的愛慾，是十九世紀末中外心理學書籍必談的核心問題。日本學者柳父章在追溯「愛」(love) 這個字的西方源頭和日文翻譯時，宣稱：漢字「愛」來自古典中文，但「戀」卻是源自「大和言葉」（日本本土語言）。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要指出的是，文字的跨界借用是語言的常態。由於我們對日常語言已經太熟悉了，以致於到底那一個字是本土的還是非本土的，其間界限實難以劃分。一個詞彙，就像一個觀念、一本書，一旦跨越了語言或是國族的界限，就各自展開新生命。與其追溯詞彙的「根源」，不如探究它的演變經過，還有它進入異文化後如何生根、如何使異文化蛻變的過程。這才是更有意義的問題。

本文在理論上要探討的是，文化翻譯的過程中，在面對各種文化體制時，個人能動性 (personal agency) 的問題。是否如同劉禾所說：翻譯者只是被動反應，由於受到體制實踐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巨大無比的掌控，以致於完全被剝奪了個人選擇的自由 (individual free choice)？還是應該說：他們是有意識的行動者，往往對所翻譯的關鍵概念字斟句酌，在各文化體制間折衝平衡，企圖突破傳統疆界？劉禾在討論文化人類學家阿薩德的文化翻譯理論時，如此描述「個人自由抉擇」(individual free choice) 和「體制實踐」之間的關係：

對類似本書的比較研究及跨文化研究而言，阿薩德對文化翻譯的評論意義深長。他提醒我們，將某種文化翻譯爲另一種語言時，〔譯者〕個人的自由抉擇或語言能力所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假如福科的教誨有任何用處，毫無疑問的，我們應該正視體制實踐的形式及知識／權力的關係，因

<sup>2</sup> 關於「東亞病夫」論述的分析及有關此主題的視覺影像討論，見 Larissa N. Heinrich,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為這種形式和關係容許某類知識的追求途徑，禁止了其他。<sup>3</sup>

劉禾對福科的解釋，似乎過度強調了體制實踐對個人選擇的全方位抑制；她所理解的，應該是早期的福科，也就是《事物之秩序》(*Les mots et les choses*, 1966)以前的福科。要複雜化這個問題，有必要了解晚期福科有關體制實踐和權力關係的理念，以及他所謂的「全方位抑制狀態」(*un état de domination*)。對晚期福科而言，權力論述並非攸關抑制／順從而已，而是討論人際、家庭、教學關係以及政治實體中的整體權力關係網絡(*un faisceau de relations de pouvoir*)；這個權力網絡是流動的，參與網絡的人均可運用各種策略來修改彼此的關係。只有當權力關係失去流動性時，才會產生全方位抑制的狀態<sup>4</sup>。

探討有關知識／權力的理論問題之前，我們應該理解，沒有任何體制權力是單獨存在的，同時必然有其他互相競逐的勢力較勁。本文將指出，翻譯者在翻譯時，訴諸各式各樣可能資源——或是當下各種不同的體制實踐——以做出最恰當

<sup>3</sup> 見 Liu, p. 3。劉禾評論的是阿薩德的文章，見 Talal Asad,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 Clifford and Marcu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141-164。拙文 “A Traveling Text: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Japanese Anarchism, and Shanghai Neo-Sensationism,” *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7 (June 2007): 1-42 指出在一九八四年的訪談記錄〈作為自我實踐的自我倫理〉(*L'éthique du souci de soi comme pratique de la liberté*)中，福柯指出「自我實踐」(*practices of the self*)和「自由實踐」(*practices of freedom*)允許個體擁有修正權力關係的可能性。參考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 (Paris: Gallimard, 2001), 2:1527-1548。本文中中文翻譯，除特別註明之外，均由本人所譯。

<sup>4</sup> 在〈作為自我實踐的自我倫理〉中，福科坦承從《事物之秩序》以來，他有關主體性與真理的觀念產生了重大的轉變。過去他的立場是「抑制性實踐」(*les pratiques coercitives; coercive practices*)，例如心理治療和監獄。他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逐漸發展出「自我實踐」(*les pratiques de soi; practices of self*)以及「自由實踐」(*les pratiques de liberté*)的看法。他如此區分「自由」和「自由實踐」的概念：「自由展開權力關係的新空間，但是權力關係必須由自由實踐來制約。」他認為權力關係是流動的，只有在心理治療和監獄制度的情況下，權力的流動才會完全被阻礙。(當然，我們可以反駁說，即使在心理治療和監獄制度中，權力關係也並非全然僵化。)對福科而言，權力流動的概念牽涉到人的主體如何進入「真理遊戲」(*les jeux de vérité; game of truth*)，而自由實踐、真理遊戲與倫理是息息相關的。他認為自由是倫理的本體條件，而倫理是自由經過深思熟慮後所採取的形式 (*Freedom is the ontological condition of ethics, while ethics is the form freedom takes when informed by reflection*)。參考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 2: 1527-1548。英文翻譯參考 “The Ethics of the Concern for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in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ed. Paul Rabinow,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London: Allen Lane, 1997), pp. 146-165。我的翻譯略微修改了 Rabinow 的英文版。

的翻譯選擇：譯者從古文、佛教或醫學典籍、他國語言甚至本土庶民表達中尋求靈感。這是一種協商，而且經常是折衝的過程，也就是十九世紀末井上哲次郎所說的「取捨折衷」（詳見下文）。在此過程中，譯者在各種體制實踐的夾縫中，不時挑戰語言規範的界限，尋找可能的突破點，結果往往開創了新的語言模式。劉禾所謂的「翻譯的現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事實上是因翻譯行為中個人能動性在越界過程中釋放出的創造性能量而生；一旦越界，無論外來語言或本土語言都將產生蛻變，這就是創造性轉化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的概念。在此繁複的過程中，個人能動性的折衝平衡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sup>5</sup>。人永遠存活在各種體制的限制中，即使貴為帝王、總統也不例外。如果個人能動性不存在，如何可能創新？歷史上如何可能發生改革、甚至革命？

其次，雖然馬希尼和劉禾在轉借字上的研究，我們都獲益良多，但是他們並未告訴我們轉借字如何從一個文化傳播到另一個文化。本文以「神經衰弱」這個辭彙的中、日文翻譯做為案例，探討此現代病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西方旅行到東方，再從日本渡海到中國的過程，目的是提出跨文化現代性 (transcultural modernity) 的概念。類此「心的疾病」的旅行過程，讓我們理解到，國家、語言的界限，無從阻礙語彙、概念的全球性流動；此過程中，文化翻譯者施展能動性，挑戰體制、開創語言模式、引進概念，是跨文化現代性的推手；跨文化的場域是他們施展創造性轉化的空間。

### 一、摩登青年對摩登女郎：

「醫癒了我的女性嫌惡症，你又送了我神經衰弱症。」<sup>6</sup>

當心理學的術語成為文學作品揶揄的目標時，心理學已然轉化為一種普及的科學知識。首先讓我們看看穆時英的小說如何運用這類新的科學術語。

<sup>5</sup> 有關翻譯的現代性，歐洲語言學家馬西尼 (Federico Masini) 給了我們許多啟發，即使這個說法是劉禾日後的發明。馬西尼研究範疇涵蓋一八四〇到一八九八年，對劉禾《跨語境實踐》一書有關新詞、轉借字的討論及書後的附錄，有很大的影響。他指出新教傳教士們對詞語創新的貢獻和日本對現代漢語形成的影響。參見 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sup>6</sup> 穆時英：〈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國新感覺派聖手·穆時英小說全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6年），頁160。

故事敘事者是一名男大學生，被一位花心的女大學生弄得神魂顛倒。他無時無刻懷疑她會「出軌」，因此寢食難安。女孩以英文名字“Alexy”稱呼他；我們的敘事者儼然是一位典型的摩登青年(modern boy)。他看畫報、抽外國香煙、上舞廳跳舞、熱愛派對和“Afternoon Tea”(小說中使用的英文)、喜歡爵士樂和“Saxophone”，甚至引用路易士·吉爾摩(Louise Gilmore)的英詩，哼唱“Rio Rita”——這是佛羅倫茲·齊格飛(Florenz Ziegfeld)一九二七年出品的同名音樂劇主題曲<sup>7</sup>。

在這位摩登青年的心目中，我們的摩登女郎可堪比擬美國影星克萊拉寶(Clara Bow)。兩人的跨文化偏好，可說是旗鼓相當。在他的凝視下，女郎有著「蛇的身體、貓的腦袋」，是「溫柔和危險的混合物」。她喜歡穿裙擺飄逸的紅綢長旗袍。她常穿的紅緞高跟鞋，襯得「這腳一上眼就知道是一雙跳舞的腳」<sup>8</sup>。她有個日本名字「蓉子」(Yōko)，喜歡雀巢牌朱古力、Sunkist、上海啤酒，還有她稱爲“Forget-me-not”的野花<sup>9</sup>。對於敘事者來說，女孩的臉部特徵就像好萊塢影星的綜合體：Wilma Banky (1903-1991)的眼睛、Nancy Carrol (1904-1965)的微笑和Norm[a] Shearer (1902-1983)的鼻子。她用英文唱“Kiss me again”、哼著“Minuet in G”。她想要「一個可愛的戀人，一個醜丈夫和不討厭的消遣品」，好讓她的生活不會太「寂寞」<sup>10</sup>。敘事者評論：「真是在刺激和速度上生存著的姑娘哪，蓉子！Jazz，機械，速度，都市文化，美國味，時代美。」<sup>11</sup>總而言之，故事中的男女主角積極擁抱大都會中所有能和「現代」掛鉤的一切。他們是新感覺派筆下典型的角色。

男女主角的關係，展現摩登女郎如何折磨臣服在她裙下的摩登青年。她口口聲聲只愛敘事者一人，但是要求他讓她接受其他男人的追求——對她而言，他們都只是是消遣品而已。花心女郎說：「愛是只能愛一個人，可是消遣品，工具是可以有許多的。」敘事者每每屈服，覺得他「享受著被獅子愛著的一隻綿羊的幸福」<sup>12</sup>。但每次他一轉身，她就投向其他男人的懷抱。針對她約會的對象，她總是編出一套謊言：這些對象，不是碩士就是博士，每個都是她的父親或哥哥爲她

<sup>7</sup> 同前註，頁 151-176。

<sup>8</sup> 同前註，頁 151。

<sup>9</sup> 同前註，頁 153。

<sup>10</sup> 同前註，頁 160、161、171。

<sup>11</sup> 同前註，頁 159。

<sup>12</sup> 同前註，頁 168、169。

挑的。當他揭穿她的謊言，她就拒絕見他，到最後總是他為自己的「錯誤舉止」向她道歉。戰爭和獵捕的意象，小說中比比皆是，用來形容他們之間的關係，如：青年描述他們的關係是「比歐洲大戰還劇烈的戰爭」<sup>13</sup>。在這場愛情的戰役裏，他註定失敗——他是戀愛上的「低能兒」<sup>14</sup>。在整場失敗的戰役中，敘事者進行自我分析時，用了許多的心理學和醫學辭彙，如同典型的新感覺派小說一般。剛開始，當摩登女郎用約會來引誘他時，他警告自己遠離女性的背叛，因為這方面他已然相當有經驗了。每當他覺得快要抵擋不住誘惑了，就躺在床上開始自我「解剖」<sup>15</sup>。他會訴諸於「女性嫌惡症」，把她看成會吞噬獵人的「危險動物」，就像吞下一片巧克力糖般：「天哪，我又擔心著。已經在她嘴裏了，被當作朱古力糖似的含著！我連忙讓女性嫌惡病的病菌，在血脈裏加速度地生殖著。」<sup>16</sup>也就是說，他非常努力地去恨她，以免被她吞噬掉。兩個戀人之間的對話，再三發揮病菌和生病的隱喻，如：

「女性嫌惡症患者啊，你是！」

從吉士牌的煙霧中，我看見她那驕傲的鼻子，嘲笑我的眼，失望的嘴。

「告訴我，你的病菌是那裏來的？」

「一位會說謊的姑娘送給我的禮物。」（意指：他恨女人，因為他曾被一位女孩背叛過）

「那麼你就在雜誌上散布著你的病菌不是？（意指：他寫有關女性嫌惡症的小說刊登在雜誌上）真是討厭的人啊！」

「我的病菌是姑娘們（由於吃太多巧克力或太多男人而引起的）消化不良症的一味單方。」

「你真是不會叫姑娘們討厭的人呢！」<sup>17</sup>

當她說不能見他，他開始到她可能出沒的所有場所去找她，宿舍、校門口、城裏的舞廳、她阿姨家（她給了錯誤的地址）等等。他甚至和她的一個追求者大打出手。可憐的情人說，他逐漸患了「神經衰弱」，也就是我所說的「心的疾病」。給女孩的信中，他寫道：「醫癒了我的女性嫌惡症，你又送了我神經衰弱症」。

<sup>13</sup> 同前註：頁 170。

<sup>14</sup> 同前註，頁 152。

<sup>15</sup> 同前註。

<sup>16</sup> 同前註，頁 153。

<sup>17</sup> 同前註，頁 153-154。

敘事者在小說中至少三次提到這個病癥<sup>18</sup>。

小說中的摩登青年和摩登女郎，充分展現了跨文化的特質，透露了混雜 (hybridity) 的精髓，挑戰所謂國家概念的穩定性和一致性。「國家」的界限其實不斷被外國文化持續滲透。小說一方面揭露國家概念的曖昧性，一方面也凸顯了二十世紀初中國白話文形成時，所呈現的流動多變常態；事實上，任何活生生的語言在任何時期都應該是如此。一個語言如果自我封閉或拒絕改變，必然會滅亡。混雜挑戰了語言的固定僵化，正是讓它保持活力的關鍵。我們看到新感覺派的語言實驗，在小說中昭然若揭。日文漢字的轉借字充斥全篇：小說中「解剖」（かいぼう）、「女性嫌惡症」（じょせいけんおしょう）、「低能兒」（ていのうじ）、「病菌」（びょうきん）、「消化不良症」（しょうかふりょうしょう）、「神經衰弱」（しんけいすいじゃく）等辭彙，都轉借自日文漢字。這些心理學和醫學詞彙反映了現代科學的發展。小說中摩登男女談笑間輕鬆吐露、俯拾皆是的專業詞彙，在在顯示出新科學術語如何進入日常生活，如何蛻變為一般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所使用的詞彙。

如同以上所見，除了敘事中所穿插的外國文句和詞語之外，音譯的外國詞彙翻譯也貫穿全文：「朱古力糖」（粵語）是“chocolate”；「啤酒」譯自“beer”等等。根據意義翻譯、組合而成的中文新詞語也比比皆是，如「雀巢牌」意指“Nescafé”。還有新詞彙是加上字尾「品」而創造出來的，字尾前面的名詞代表某種功能，例如：「消遣品」意指玩物；「刺激品」意指興奮物。「品」在日文中唸成「ひん」意指「成品」、「產品」或「品質」，類似古典中文的用法。以「品」字和其他字組合成的辭彙，已經是當代漢語的慣例，如「消費品」、「精品」、「絕品」等等。從當年沿用到今天的，還有其他二個字尾：「性」（せい），意指品質或本質；「物」（ぶつ），用來界定具有某種特質的人或物。如小說中的「男性」（だんせい），「女性」（じょせい）。至於字尾「物」，例如「混合物」（こんごうぶつ），意指綜合體，被敘事者用來形容摩登女郎，說她是「溫柔 and 危險的混合物」。動物（どうぶつ）一詞，亦被敘事者用來形容她是「一個危險的動物」。在今天的語法裏，字尾是「物」的辭彙不勝枚舉，如「生物」（せいぶつ），意指有生命的個體；「無生物」（むせいぶつ），沒有生命的個體。大部分使用這類字尾的詞彙都牽涉到生物學、心理學和商業用語，

<sup>18</sup> 同前註，頁 161、163、165。

亦與科學知識和現代資本主義流通有關。無疑地，現代知識需要新語言來傳達意義。

新感覺派小說家正在尋求一種嶄新的文學語言和敘述模式；穆時英對自己在此文學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高度自覺。小說中有一段，除了為摩登女郎的心智發展開出讀本處方，也顯露出穆時英認為哪一種文學已經「過氣」，哪一類才是他所信奉的新文學形式。敘事者「努力在戀愛下面，建築著友誼的基礎」，問蓉子道：

「你讀過《茶花女》嗎？」

「這應該是我們的祖母讀的。」

「那麼你喜歡寫實主義的東西嗎？譬如說左拉的《娜娜》，朵斯退益夫斯基的《罪與罰》……」

「想睡的時候拿來讀的，對於我是一服良好的催眠劑。我喜歡讀保爾穆杭，橫光利一，堀口大學，劉易士——是的我頂愛劉易士。」

「在本國呢？」

「我喜歡劉吶鷗的新的藝術（げいじゅつ），郭建英的漫畫（まんが），和你那種粗暴（そぼう）的文字，獷野（こうや）的氣息……」<sup>19</sup>

這段對話表面上是摩登男女之間不經意的對話，事實上顯現的是作者的文學批評和自我反射。穆時英是自覺性極高的作家，他把自己和新感覺派同儕與日本新感覺派合流，同時也清楚認識到保爾穆杭是中日新感覺派共同的淵源。這段對話等於在宣告，十九世紀歐洲寫實主義大師如大仲馬、左拉、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年輕人來說已然過時，而新感覺派的小說風格是企圖與這個宏大的寫實傳統劃清界線。穆時英蓄意將新感覺派小說家和愛爾蘭著名的科幻小說和童書作家劉易士相比擬，可說在宣示新感覺派寫作目標是要縮小菁英和大眾文學的鴻溝——文學沒有理由不是男女大學生所瞭解和喜愛的讀物。當代作家魯迅和沈從文於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年間，也就是〈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一文發表時，曾經為文批評穆時英等新感覺派小說家迎合大學女生品味和商業主義<sup>20</sup>。透過摩登女郎對新感覺

<sup>19</sup> 同前註，頁 159。

<sup>20</sup> 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京派海派論爭持續熱化之前，周作人寫過一篇名為〈上海氣〉的文章，嘲諷上海文化只是買辦、流氓和妓女文化。見 Zhang Yingjin, "The Haipai Controversy," in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Configurations of Space, Time, and Gen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27; 拙著：《海上說情慾：從張資平到劉吶鷗》（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頁



派的高度評價：「劉吶鷗的新的藝術，郭建英的漫畫，和你那種粗暴的文字，獷野的氣息」，穆時英的立場毋庸置疑：新感覺派正實驗一種嶄新的寫作風格，和當時普遍的寫實風格大異其趣；新感覺派嘗試傳達的現代感覺，具有「獷野氣息」或「原始主義」。此外，摩登女郎所拒絕閱讀的文本當中，《茶花女》不只是一本過氣小說，還是過時的翻譯。《茶花女》是林紓的第一本譯作，不只以文言文翻譯，而且把外國作品同化了；相對的，新感覺派則試圖在作品中創造一種全新的語言，強調的是異化和混雜的特色。

一方面，這篇小說反映了大都會中男女大學生的心態和語言習慣，中外文混雜的語言 (the macaronic) 對他們來說稀鬆平常。另一方面，由於胡適於一九一七年主張白話文學摒棄古文的陳腐套語和典故，到了一九三〇年代，我們看見取而代之的是現代科學知識辭彙的戲謔運用，使得蛻變中的白話文顯得生硬可笑。最重要的是，穆時英小說中隨意運用科學術語的故事人物，反映出心理學等開始在中國建制為學科之時，醫學知識如何型塑每個人對自己心靈和身體的瞭解。下一節將指出，中國心理學的建制和日本心理學的發展息息相關。

## 二、日本及中國的心理學建制

影響日本心理學發展最重要的人物是西周 (1829-1897)。他於一八六七年抵達荷蘭，是江戶幕府派遣到歐洲學習哲學和心理學的第一位日本留學生。從他的上課筆記可明顯看出，和同時代的日本知識分子一樣，他必須仰賴他耳濡目染的儒家思想概念，來理解西方的學術：自然世界對他而言就是「氣」，人的內在心智就是「理」，因此科學變成「氣科」，人文學變成「理科」。他根據宋明理學的訓練，在上課筆記中用「性理學」一詞來翻譯“psychology”。西周課堂筆記的手跡，處處可見儒家典籍的引用，例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論語》）；「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等等（圖一）<sup>21</sup>。如果我們可以說儒學教育是江戶日本體制實踐的一部分，這些中國古籍的引用，顯現出一個儒家學者有意識地努力在傳統典

95-103。

<sup>21</sup> 佐藤達哉：《日本における心理學の受容と展開》（京都：北大路書房，2002年），頁30。

籍中尋找一些概念，來對照他當時在西方課堂中所學。明顯地，西周不滿意「心理學」一詞，他稍後於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間翻譯 Joseph Haven (1816-1874) 的 *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 (1857) 一書時，藉由結合「心」和「理」兩個字，創造了新詞「心理學」來翻譯標題<sup>22</sup>。顯而易見，就西周而言，要談論新知識，創造新詞是必要的。這個新詞的創造，自從西周在荷蘭留學期間起，花了他八、九年的深思熟慮才得以成形。此新詞不久即成爲明治日本時期翻譯“psychology”的標準用語。

明治維新之後，心理學是教師訓練的必修課程。東京師範學校（現爲筑波大學）在一八七九年課程改制，增加心理學課程，並使用西周翻譯海文 (Joseph Haven) 的書做爲教科書。曾就讀於麻州橋水 (Bridgewater) 師範學校（現爲橋水州立學院）的伊澤修二，以及曾在奧思維戈 (Oswego) 師範學校（現爲紐約州蘇尼的奧思維戈學院 [Sunny Oswego]）求學的高嶺秀夫，是當時課程改革的策劃者。東京帝國大學也在一八七三年開設心理學課程。先後就讀於波士頓大學和霍普金斯大學的元良勇次郎，一八九〇年在東大成爲日本第一位專業的心理學教授<sup>23</sup>。日本方面不再贅言，以下要將焦點轉向中國心理學做爲學科之演變。

約瑟海文的 *Mental Philosophy* 也是譯介到中國的第一本有關心理學的書，出版於一八八九年，但是似乎和西周的翻譯沒有關聯<sup>24</sup>。譯者顏永京 (1838-1898) 是聖功會的牧師，並在上海擔任聖約翰大學 (1905-1952) 校長八年。他十四歲被帶往美國，並於一八六一年在俄亥俄州的肯陽學院 (Kenyon College) 獲得學士學位<sup>25</sup>。他把海文的書名譯成《心靈書》，是用古文翻譯的，而且只出版了第一卷，包含導論和論智慧 (intellect) 的部分<sup>26</sup>。此書似乎對往後的心理學翻譯和研究沒有什麼影響。接下來將回顧，在中國現代教育體制形成時期，日本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引介現代知識的日本新詞在二十世紀初大量流行於中國，這一點是主因；相對的，自十六世紀末起歐洲傳教士所創造出來的大多數新詞，卻逐漸黯然

<sup>22</sup> 同前註，頁 31-35。

<sup>23</sup> 同前註，頁 34。

<sup>24</sup> Cf. Zhang Jingyuan, *Psychoanalysis in China: Literary Transformations, 1919-1949* (Ithaca: East Asian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2), pp. 37-38.

<sup>25</sup> Scott Sunquist, ed., *A Dictionary of Asian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1), p. 916.

<sup>26</sup> 約瑟海文 (Joseph Haven) 著，顏永京譯：《心靈書》（上海：益智書會，1889年）。

失色<sup>27</sup>。

在中國首先把心理學納入課程的，是創立於一九〇二年的京師大學堂師範館，也就是今日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北京大學創立於一八九八年，隨後於一九〇三年創立北京大學醫學院。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中國的現代教育體制和師範學校的課程，都以日本為模範。課程的教科書和講義，大都譯自日本學校的教材<sup>28</sup>。心理學（或其他學科）在中國建制為學科時，對於日本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到目前為止心理學以外的學界對此著墨不多<sup>29</sup>。

日本於一八九八年建立東亞同文會後，日華學術交流變得活躍。當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創立時，日本新儒家學者及東大助理教授服部宇之吉，應邀至中國協助創設教師訓練課程。他曾於一八九九年留學中國一年，之後轉赴德國深造三年。一九〇二到一九〇九他停留北京的期間，開設了教育、心理學和邏輯課程<sup>30</sup>。他的心理學課程講義至今仍保留在北大和南京大學的圖書館裏。根據《中國心理學史》，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八年間所使用的教科書或課堂講義，其中現存的三十本中有二十本是翻譯或改編自日本翻譯西方原典的教科書，或抄寫自日籍老師的授課筆記<sup>31</sup>。由於教學上的優勢，日本有關新知識的新詞在中國立即勢不可擋，實非意外。

<sup>27</sup> 馮天瑜指出這個事實，但未說明原因。見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17-277、510-511。

<sup>28</sup> 根據阿部洋所述，日華學術交流的高峰期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間。當時駐在中國的日籍教師約五、六百人，大多在師範學校任教。見阿部洋：《中國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東京：福村出版，1990年），頁151-152；高覺敷編：《中國心理學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378-390。Elisabeth Kaske, “Cultural Identity, Education, and Language Politics in China and Japan, 1870-1920,”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in Global Context*, ed. David L. Hoyt and Karen Oslund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6), pp. 215-256.

<sup>29</sup> 見Zhang Jingyuan 著作。此書指出受美式教育的心理學家，一九三〇年代回國後成為中國心理學的主要推手（p. 25），但並未討論之前的情況。亦請見劉紀蕙：〈壓抑與復返：精神分析論述與現代主義的關聯〉，《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4卷第2期（2001年1月），頁31-61。劉紀蕙在此文中討論了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間的中國心理學家，如於一九三三年翻譯佛洛伊德的高覺敷和在一九二六年撰寫《變態心理學》的朱光潛，大都是受歐美教育。高覺敷則於一九二三年畢業於香港大學。

<sup>30</sup> 見阿部洋：《中國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頁155-156和Harrell, Paula 即將出版於 *Asia for the Asians: Japanese Advisors in China, 1895-1915*（書名暫定）一書中的一章“Guiding Hand: Hattori Unokichi in Beijing”。

<sup>31</sup> 高覺敷編：《中國心理學史》，頁385。

一九一〇到一九二〇間，越來越多中國學生不至日本而赴歐美留學，中國心理學走向因此也轉向歐美。北大校長蔡元培曾在萊比錫大學研讀心理學、歷史和文化，於一九二六年創立了心理系。但是第一任指派的系主任陳大齊依然是留日，且在東京帝國大學取得學位。清華大學亦在一九二六年創設教育心理學系，目標是研究人類如何在教育體系中學習，於一九三〇年改名為心理系<sup>32</sup>。由於佛洛伊德學說的影響，在中國，變態心理學也成為大多數心理系課程一部分<sup>33</sup>。

欲了解心理學這個新學科在當時受到的關注，我們可以透過潘光旦的作品來了解。他於一九二四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後來成為著名的優生學家和心理學家<sup>34</sup>。一九二二年他選修著名報人兼學者梁啟超在清華大學開設的「中國歷史的方法論」，寫了〈馮小青考〉作為期末報告<sup>35</sup>，以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來分析一位明代婦女的「變態心理」。梁啟超十分讚賞潘光旦的天分。文章修改後，於一九二四年發表於《婦女雜誌》<sup>36</sup>。

馮小青十六歲嫁人為妾，兩年後死於肺結核。當代及稍後的評論普遍認為她是心碎而死，因為據說正婦嫉妒心極強，有半年之久禁止她見丈夫。但潘光旦從她的詩作和死前給密友的書信中，發現她使用大量鏡子和水的意象；她死前，也請畫師多次為自己作畫像，力求完美。潘認為，這在在顯示她備受「影戀」（原文加上 Narcissism）之折磨<sup>37</sup>。「影戀」是潘自創的新詞。他指出馮小

<sup>32</sup> 同前註，頁 385-387。

<sup>33</sup> 根據張京媛書後的附錄，以下都是早期被介紹至中國的精神分析導論。王國維：《心理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譯自 Mary E. Lowndes, trans., *Outlines of Psycholog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1; 譯自德文版)，原作者為丹麥學者 Harald Höffding (1889)；Y：〈佛洛特新心理學之一斑〉，《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22 期（1920 年 11 月 25 日），頁 85-86；朱光潛：〈福魯德的隱意識說與心理分析〉，《東方雜誌》第 18 卷第 14 期（1921 年 7 月 25 日），頁 41-51。

<sup>34</sup> 見費孝通：〈重刊潘光旦譯注靄理士《性心理學》書後〉，收入靄理士著，潘光旦譯注：《性心理學》（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頁 549-558。

<sup>35</sup> 一九二七年《小青分析》的〈敘言〉，收入潘乃穆、潘乃和編：《潘光旦文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 3。

<sup>36</sup> 潘光旦：〈馮小青考〉，《婦女雜誌》第 10 卷第 11 期（1924 年 11 月），頁 1706-1717。此文修改補寫後，一九二七年由新月社出版為書。收錄於《潘光旦文集》中的一九二九年版為一九二七年的修改版。

<sup>37</sup> 在《婦女雜誌》上所發表的〈馮小青考〉，自戀的英文詞彙錯拼成“Narcism”。有關潘光旦文章內容的細節敘述，請見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90-199。作者認為潘光旦對馮小青的精神分析詮釋，大別於傳統文人專注於儒家「情」之詮釋，而此過渡顯現出典

青是「精神拗戾」（原文加上 psychoneurosis）的病患<sup>38</sup>。他也點出馮小青具有自戀人格的特質：自我崇拜、自我中心和自我關注。詞彙如「影戀」（narcissism）、「精神拗戾」（psychoneurosis）、「變態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潛意識」（subconscious，譯自日文的「潛在意識」）、「性心理之變態」（sexual inversion）、「憂鬱症」（hypochondria）和「精血衰弱」（neurasthenia）等，皆是佛洛伊德於一九一四年發表的〈論自戀〉一文中的用語。潘文章中事實上也直接引用佛洛伊德理論，顯示出佛氏是他研究馮小青案例的主要靈感來源。值得注意的是潘光旦用「精血衰弱」一詞來翻譯“neurasthenia”，而不是「神經衰弱」。「精血」是傳統醫學用來解釋人體性命所在的詞彙，所謂「精血不榮。骨髓枯竭」<sup>39</sup>。本文稍後將指出，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以「神經衰弱」來翻譯“neurasthenia”才普遍流行，即使這個新詞在一九一〇年已被引介到中國醫學文本中。到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間，潘光旦翻譯靄理士（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學》（*Psychology of Sex: A Manual for Students*）時，就用了「神經衰弱」一詞來翻譯“neurasthenia”<sup>40</sup>。自一九二〇年代末起，神經衰弱一詞在中國已普為人知，以至於潘光旦不得不採用此翻譯，而捨棄了他之前所自創的新詞。詳見下文。

另一位對中國早期心理學發展相當重要的人是英國心理學家 Havelock Ellis (1859-1939)，在佛洛伊德之前即提出性倒錯（sexual inversion）、自體情慾（auto-eroticism）和自戀概念。他的作品在日本和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廣為流傳。F. A. Davis 出版社從一九〇五到一九二八年間陸續出版共計七冊的《性心理學》，收錄了他二十餘年的著作<sup>41</sup>。一九一三年初，周作人寫道：「靄理斯（Havelock Ellis）是我所最佩服的一個思想家。」<sup>42</sup>他在一九二五年翻譯了靄理士 *Impressions*

---

範的轉移。

<sup>38</sup> 原文為英文，在一九二九年的版本中譯成「精神拗戾」。

<sup>39</sup> [明]朱橚等編：《普濟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卷221，頁3416。

<sup>40</sup> 靄理士著，潘光旦譯注：《性心理學》，頁473。譯自Havelock Ellis, *Psychology of Sex: A Manual for Student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Medical Books Ltd., 1933), p. 302。

<sup>41</sup> Havelock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 1905-1928)。潘光旦宣稱他在一九二〇年時已在清華大學圖書館看到前六冊，並於一九二八年看到第七冊。見潘光旦：〈譯序〉，《性心理學》，頁1-7。整套書由Random House於一九三六—一九四二年間出成二冊，共分成七部分。

<sup>4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靄理斯的話〉，《雨天的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88-90。

*and Comments* (1914-1924) 一書中的幾段文字<sup>43</sup>，在一九四四年書寫和靄理士相關的文章，讚賞他的觀點「既不保守也不急進」，亦即符合「中庸」之道<sup>44</sup>。除了這幾篇簡介，周作人並未深入涉獵靄理士的理論。運用這些理論建立雛形性學觀的人，是性學博士張競生。一九二六年他發表以案例史寫成的《性史》一書，是根據靄理士的《性倒錯》體例。我在其他文章已討論過此議題，此處不贅<sup>45</sup>。要簡單說明的是，潘光旦在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間所翻譯的《性心理學》，是譯自一九三三年所出版的 *Psychology of Sex: A Manual for Students*，這是七卷《性心理學》的縮節版單行本<sup>46</sup>。

日本在一九二一到一九二四年間，鷺尾浩譯出七種靄理士的著作，其中之一是《人間の性的選擇》(1905)<sup>47</sup>。以下將以鷺尾所翻譯的幾個重要概念，來綜觀西方科學術語的日文翻譯如何改變現代日語和漢語的詞彙。其中的關鍵概念之一是「神經衰弱」，也就是「心的疾病」。

### 三、如何為五官感受及神經衰弱命名

科學詞彙的翻譯提供了專門的術語，讓我們得以用來談論我們的身體、心智、心靈或感覺。本文僅提出二個例子。靄理士的 *Sexual Selection in Man* 中，主要論點之一是“touch, smell, hearing, and vision”在類人的性選擇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sup>48</sup>。在鷺尾的翻譯中，這些詞彙被譯成「觸覺」、「嗅覺」、「聽覺」、「視覺」<sup>49</sup>。用「覺」這個名詞字尾來翻譯五官感受，事實上是井上哲次

<sup>43</sup> 周作人：〈靄理斯隨感錄抄〉，《永日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57-64。

<sup>44</sup>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下冊，頁770-773。

<sup>45</sup> Cf. Peng Hsiao-yen, “Sex Histories: Pornography or Sexology? Zhang Jingsheng’s Sexual Revolution,” in *Feminism/Feminin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ed. Peng-hsiang Chen and Whitney Crothers Dilley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B.V., 2002), pp. 159-177.

<sup>46</sup> 潘光旦：〈譯序〉，《性心理學》，頁1-7。

<sup>47</sup> 鷺尾浩譯：《性的心理·第一卷·人間の性的選擇（上）》（東京：冬夏社，1921年）。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導論》於一九二六年由安田德太郎譯成日文，可能是佛洛伊德的書第一次出版為日文。見安田德太郎：《精神分析入門》（東京：アルス，1928年）。較晚的版本，請見角川書店於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版本。

<sup>48</sup> Havelock Ellis, *Sexual Selection in Man*, in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6-1942), 4: 1-212.

<sup>49</sup> 見鷺尾浩譯：《性的心理·第一卷·人間の性的選擇（上）》。

郎 (1855-1903) 首創。他曾於一八八四到一八九〇年留學德國，後來成為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一八八二年他把 Alexander Bain (1818-1903) 的 *Mental Science* 翻譯為《心理新說》時，就使用了「覺」作為字尾來創造這些新詞<sup>50</sup>。早先西周在他的譯作《心理學》中創造了新詞「五官」，並使用「觸覺」來翻譯“touch”一詞，但是他使用「聞くこと」來翻譯“hearing”，以「見ること」來翻譯“sight”。「こと」加在動詞原形後面，是日文把動詞變成名詞的一種詞彙衍生法<sup>51</sup>。「觸覺」一詞是西周創造出來的，但是說明其他四種感官功能的術語，要歸功於井上的翻譯。

稍後在一八九八年編給師範學生使用的《心理撮要》一書中，中島力造 (1858-1918) 使用「感」當作字尾造出新詞「觸感」、「嗅感」、「聽感」、「味感」、「視感」來形容五官感受<sup>52</sup>。但由歷史可知，井上所創「覺」字尾的新詞在日本和中國普遍被接受，而中島所創的「感」字尾新詞卻被遺忘。有趣的是，中島將“mental life”譯成「心的生活」而非「腦的生活」，但在西方，mental life 指的是大腦的活動。中島的譯法很明顯是根據西周對心理學的詮釋<sup>53</sup>。我們知道一九一四年大瀨甚太郎編輯另一本《心理撮要》給師範學校學生作為教科書時，就選擇了用井上翻譯的「覺」字做為字尾<sup>54</sup>。

井上哲次郎以漢文所寫的序中，展現了他對儒學和西方哲學的理解，並對東西方傳統都做了簡單的介紹。在將東西方並列時，井上讚賞培因 (Bain)、約翰·彌爾 (John Mill) 和史賓賽 (Spenser) 為實驗心理學的佼佼者，代表了西方科學和哲學的巔峰成就。他同時也惋惜自明朝王陽明以降中國哲學的停滯不前：「支那

<sup>50</sup> 井上哲次郎譯：《心理新說》第一卷（東京：青木輔清，1982年），頁19-33。亞歷山大·培因 (Alexander Bain) 的原標題為 *Mental Science: A Compendium of Psych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Designed as a Text-Book for High-Schools and Colleges*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868)。原書中有關五官感受的說法，在第一卷的第二部分。

<sup>51</sup> 在西周的翻譯中，有關五官感受、「五官」、「觸感」的篇章，是在第二卷第一部分第三章節，見西周譯：《心理學》第二卷（東京：文部省，1875-1876年），頁45。有關西周譯《心理學》之討論，請見佐藤達哉：《日本における心理學の受容と展開》，頁37。

<sup>52</sup> 中島力造編：《心理撮要》（東京：普及舍，1898年），頁40-44。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之館藏。此書的基礎是 George Trumbull Ladd 於一八九八年所著 *Outlines of Descriptive Psychology: A Text-Book of Mental Science for Colleges and Normal Schools* (New York: Scribner, 1898)。中島在耶魯大學就學時，曾受教於 Ladd。

<sup>53</sup> 中島力造編：《心理撮要》，頁16。

<sup>54</sup> 大瀨甚太郎：《心理撮要》（東京：成美堂書店，1914年）。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之館藏。

亦不乏哲學。而繼起無人。故遂不大興。」<sup>55</sup>培因的原著中事實上包含心理學、生理學和哲學，但井上企圖把心理學作為西方科學的根基來傳播，因此刪去和心理學無直接相關的部分。他節譯的另一個原因是：「其（培因）論涉純正哲學處。間有不確當者。且其書浩瀚。不便童蒙。故就其切要處。取捨折衷。作為此書。」<sup>56</sup>井上深刻體認到自己在翻譯行為中所發揮的能動性，坦承他自己的主觀介入。由於語言的不對等性，某種程度的「取捨折衷」是所有譯者必須仰賴的，無論譯者是否有心「忠於」原著。

井上使用「觸覺」、「嗅覺」、「聽覺」、「味覺」、「視覺」來翻譯五官感受，明顯受到佛家語的影響。由於井上於一九二〇年著有《釋迦牟尼傳》<sup>57</sup>，可想見他嫻熟佛教教義和辭彙，也可理解他的五官詞彙的翻譯是佛教經典影響的結果。在中國佛教或醫書文本中，「覺」字出現在觸、味、聽等字後時，「覺」字是作為動詞使用。舉例來說，在醫書《東垣醫集》中的〈草豆蔻丸〉寫道：「發作時腹中有塊狀物腫聚，即蛔蟲結聚成團，可以觸覺。」<sup>58</sup>或是明代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的文本中，「試將舌舐，味覺甘美，但恨其少」<sup>59</sup>。在此二例中，「覺」皆意指「感受到」。現代漢語借用日文漢字的表達，將五官感受變成了名詞。如果我們參考陳大齊於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心理學大綱》，他已經使用了「觸覺」、「嗅覺」、「聽覺」和「視覺」等詞彙<sup>60</sup>。陳大齊於一九一八年在東京帝國大取得學位，這些詞彙出現在他的著作中並不令人意外<sup>61</sup>。潘光旦所譯之《性心理學》，名為〈性的生物學〉的第二章中，也使用這些日文借詞<sup>62</sup>。透過日文對西方科學文獻的翻譯，中文才得以為五官感受命名。

另外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是鷺尾浩對“neurasthenia”一詞的翻譯，出現在靄理士的 *Sexual Selection in Man* 中第三章談到嗅覺的部分<sup>63</sup>。鷺尾用「神經衰弱」

<sup>55</sup> 井上哲次郎譯：《心理新說》，頁 iii。

<sup>56</sup> 同前註。

<sup>57</sup> 舉例來說，井上哲次郎：《釋迦牟尼傳》（東京：文明堂，1903年）。此書共有三種版本。另外二個版本分別出版於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二六年。

<sup>58</sup> [金]李東垣著，丁光迪、文魁編校：〈東垣試效方〉，《東垣醫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年），卷2，頁422。

<sup>59</sup> [清]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臺北：里仁書局，1991年），卷25，頁288。

<sup>60</sup> 陳大齊：《心理學大綱》（北京：北京大學編譯會，1921年），頁80-107。

<sup>61</sup> 高覺敷編：《中國心理學史》，頁388。

<sup>62</sup> 靄理士著，潘光旦譯注：《性心理學》，頁41-94。

<sup>63</sup> See Havelock Ellis, “The Sense of Smell in Neurasthenic and Allied States,” in *Studies in the*



來翻譯這個詞，事實上三浦謹之助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神經病診斷表》<sup>64</sup>已使用過<sup>65</sup>。三浦討論他所舉出的病癥時，也提供德文術語。他將下列疾病診斷為「官能的疾患」（此詞沒有提供德語詞彙，意指受到性欲望刺激所引發之疾病）：「ヒポコンデリー」(Hypochondrie)，「神經衰弱」(Neurasthenie)，「ヒステリー」(Hysterie)。「官能的」是“functional”的翻譯，是心理學被譯介到日本來時所創造出來的新詞。在三浦的書中，“hysteria”有時被音譯成漢字「歇斯的里」。作者自陳：「神經衰弱是憂鬱症的原因。除此之外，神經衰弱多多少少混合了憂鬱症的病癥，往往和性器官使用過度有關，精神容易被過度刺激的狀況，類似歇斯的里症狀。」<sup>66</sup>即使作者沒有指出資料來源，從他主要概念所使用的德國名詞可以看出作者德國醫學理論訓練的背景。此書的德文標題為“Diagnostische [Diagnostische] Tabellen für Nervenkrankheiten”。

「神經衰弱」這個詞約於一九一〇年代出現在中國。我在臺北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裏所能找到最早有關神經衰弱的書籍，是一九一〇年上海醫學書局所出版，由丁福保、華文祺所編的《神經衰弱三大研究》<sup>67</sup>。此書現已不

---

*Psychology of Sex*, Vol. I, part 3, p. viii.

<sup>64</sup> 鷺尾浩譯：《性の心理・第一卷・人間の性的選擇（上）》，頁6。Hugh Shapiro 指出杉田玄白在其一七七四年的譯作《解體新書》中創造「神經」一詞來翻譯“nerves”。參見 Hugh Shapiro：“Neurasthenia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Nerves into China.”。

<sup>65</sup> 三浦謹之助：《神經病診斷表》（東京：三浦謹之助，1894年）。此書似乎由作者自行出版。Hugh Shapiro 提及下列書籍也使用「神經衰弱」一詞（“Neurasthenia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Nerves into China”）。田村化三郎：《神經衰弱根治法》（東京：健友社，1911年）。此書基本上是醫療手冊，條列神經衰弱各種治療法，如水療、電療、催眠療法、注射等等。作者為執業醫生。

<sup>66</sup> 三浦謹之助：《神經病診斷表》，頁62-63。

<sup>67</sup> 丁福保、華文祺：《神經衰弱三大研究》（上海：醫學書局，1910年）。中國第一家精神病院於一八九八年由美國長老教會傳教士克爾(John Kerr)醫生建立於廣州。參考 Veronica Pearson, *Mental Health Care in China: State Polici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London: Gaskell, 1995), pp. 8-29。Arthur Kleinman 則認為第一家精神病院建立於一八九七年。他指出一九一九年北京聯合醫科大學的神經學和精神醫學的首位主任是伍茲(A. H. Woods)，他從一九二二年起，同時教授這兩門學科，是中國眾多醫學院中第一位相關學科的教授。參考 Arthur Kleinman, *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7。根據他的研究，「神經衰弱」一詞最早出現於一九二三年《中國醫學期刊》(China Medical Journal) 有關「當前醫學文獻」(Current Medical Literature) 部分的一篇摘要中，當中引用了比利時醫學期刊上道威(F. Dauwe)對神經衰弱的討論。他所能找到的最早的關於神經衰弱的中文文獻是一九三六年宋明堂(Song Mingtang)在《同濟醫學

存，但從圖書資料中用來描述此書性質的詞語，如「官能症」和「神經衰弱」看來，我們可以推斷，此書是根據日文資料編著而成。

我看到最早談論神經衰弱的醫療手冊，是一九一七年盧壽籤以文言文所寫成的《神經衰弱療養法》。此書的基礎是一九一五年日人井上正賀所著之《神經衰弱營養療法》<sup>68</sup>。盧氏在此書序言中，將神經衰弱歸因於「世界文明」與「生存競爭」。歐美人過於縱欲、中國特有的禮教束縛（性壓抑）和胃腸疾病，都被列為導致神經衰弱的主因<sup>69</sup>。盧氏質疑過度理論化的傾向以及醫學物理療法，認為如井上所建議之營養和睡眠療法是最好的處方。井上營養療法之基礎就是攝取足夠的米飯和全穀類，這是日本的傳統飲食，也是盧氏認為有效的自我療法之一<sup>70</sup>。這似乎是一種「東方」的神經衰弱治療法，明顯地在駁斥美國神經學家喬治·畢爾德 (George Beard 1839-1883) 的「神經疾患飲食」(the diet of the nervous) 理論。詳見下文。盧氏的遣詞用字顯露出他對中國古典醫學詞彙的高度依賴，例如井上書名中的「營養療法」，他翻譯成「療養法」。「療養」是傳統中醫用來談論調和養生的概念，而「營養」是日人用來翻譯“nutrition”的詞彙。但在正文中，盧氏就使用了日文漢字術語，如「營養」、「完全營養」、「日光浴」、「溫泉浴」等等。如「溫泉」之類的辭彙，當然是出自古典中文。

相較之下，王羲和於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譯作《神經衰弱自療法》，以白話文寫成。此書是根據畢爾德理論編譯而成<sup>71</sup>。一般認為畢爾德在一八六九年發表的著名論文“Neurasthenia, or Nervous Exhaustion”中，創造了這個疾病。但是也有人，包括佛洛伊德在內，認為這個新詞彙描述的是英國早有的舊疾，自十七世紀中葉起就已經受到注意<sup>72</sup>。畢氏一八七一年的《醫學與手術電療法》(The Medical

---

季刊》上發表的論文，題為〈神經衰弱〉(pp. 25-28)。此書中文翻譯，參考凱博文著，郭金華譯：《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現代中國的抑鬱、神經衰弱和病痛》（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頁3-18。

<sup>68</sup> 盧壽籤：《神經衰弱療養法》（上海：中華書局，1917年）；井上正賀：《神經衰弱營養療法》（東京：大學館，1915年）。

<sup>69</sup> 盧壽籤：〈總說〉，《神經衰弱療養法》。頁1-2。

<sup>70</sup> 盧壽籤：〈序〉，同前註，頁1-2、15-20。

<sup>71</sup> 王羲和：《神經衰弱自療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頁3。

<sup>72</sup> 參見 Marijke Gijswijt-Hofstra and Roy Porter, eds., *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B. V., 2001), pp. 1-76。這是神經衰弱文化的比較研究，針對不同國家，包括英國、美國、德國、荷蘭和法國，也論及中國和日本。畢爾德“Neurasthenia, or Nervous Exhaustion”這篇文章發表於 *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3 (1869): 217-221 (Porter, p. 71)。有關佛洛伊德對畢爾德的看法，參

and *Surgical Use of Electricity*) 譯成德文後，在歐洲蔚為風潮<sup>73</sup>。在一八八一年的《美國人的焦慮》(*American Nervousness*) 一書中，畢爾德指出神經衰弱是美國人特有的疾病，因現代文明如工業和都市化、極端氣候（極熱、極冷或極乾）或過度耽溺於飲食及性慾而引發<sup>74</sup>。畢氏死後出版於一八八四年的《性神經衰弱》(*Sexual Neurasthenia*) 一書裏，畢爾德列出了神經衰弱的種種病症，包括腦神經衰弱、脊髓性神經衰弱、消化性神經衰弱、性神經衰弱、創傷性神經衰弱、歇斯底里性神經衰弱和「半身神經衰弱」<sup>75</sup>。他把腦、胃和生殖系統稱為「三位一體」，當一個部位受到損傷，其他二者全受影響。他建議混合性療法，包括電療、水療、注射等等，但認為完全不用藥物的食物療法，要遠優於完全使用藥物而不靠食物的療法<sup>76</sup>。行文至此，我不禁恍然大悟：穆時英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中，男主角為何總是玩弄消化不良（起因於吃太多巧克力或男人）和神經衰弱之間的關係。

畢爾德花了許多工夫闡釋演化論，但其實都是他個人對演化論的詮釋，例如他認為「人類身體功能在演化進程中發展最慢的是生育和創作的功能——也就是傳種的能力和抽象思維（包括記憶）的能力……因此，當神經系統受到疾病攻擊而衰弱時，這些最晚演化的功能……就會受損。」<sup>77</sup>在第八章〈神經疾患飲食〉中，畢爾德又再次訴諸於他自己的演化觀念：「演化論就是宇宙的生成自承一系列，從簡單到複雜。」<sup>78</sup>根據他的演化觀，他認為對人類來說最好的食物就是在演化位階上最接近人的食物，換句話說，就是肉類、蛋、牛奶和魚。他反對食用水果、蔬菜、穀類（小麥例外）、脂肪（奶油例外）。如果體質特別纖弱，奶油，甚至麵包都不推薦食用。這種觀念和我們今天認可的健康食品大相逕庭。就此而論，先前提及的井上正賀《神經衰弱營養療法》一書，可說是蓄意挑戰畢爾

---

見 Philip Wiener, "G. M. Beard and Freud on 'American Nervousnes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7. 2 (April 1956): 269-274。

<sup>73</sup> Cf. Wiener, p. 270.

<sup>74</sup> Gijswijt-Hofstra and Porter, p. 54.

<sup>75</sup> 畢爾德說：「神經衰弱有時影響身體半邊，通常是左半身，右半身較少。這種現象我稱為半身神經衰弱。」見 George Beard, A. M., M. D., *Sexual Neurasthenia: Its Hygiene, Causes, Symptoms and Treatment: with a Chapter on Diet for the Nervous*, ed. with a preface by A. D. Rockwell (New York: Arno Press and the New York Times, 1972), p. 55.

<sup>76</sup> *Ibid.*, p. 73.

<sup>77</sup> *Ibid.*, p. 66.

<sup>78</sup> *Ibid.*, p. 269.

德的理論。

儘管畢爾德的神經衰弱理論看起來多麼幼稚，神經衰弱這個病理心理學的觀念的確因他而發揚光大，跨越大西洋也傳播到東方。他的文化和社會病因學，與佛洛伊德的心理治療學說大異其趣；後者強調的是焦慮型神經症 (neurosis) 和性壓抑的關連。根據菲力浦·懷那 (Philip Weiner) 的說法，一八九五年佛洛伊德〈理應從神經衰弱中區分「焦慮型神經症」為一特定症候群〉<sup>79</sup>一文中，相當重視畢爾德。在此文中，即使佛洛伊德不同意所謂神經衰弱是美國人特有的疾病，卻讚許畢爾德是第一位觀察到這種特殊癥狀的美國醫師，並認為他發現這種癥狀和現代生活的關連，是一大貢獻。

大約一九二〇年代中期，神經衰弱一詞出現於中國現代文學。如同本文稍早所指出，穆時英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吃盡摩登女郎苦頭的摩登青年反覆訴說他患了「神經衰弱症」時，態度輕佻戲謔，一派新感覺派作家對現代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慣常嘲諷。穆時英對科學詞彙的這種戲謔態度，事實上顯現出他另有所指：他嘲諷的對象不只是小說裏的摩登男女，更是某些當代作家，不但正經八百地使用心理學詞彙，還把它們轉化為創作的母題。一九二〇年間，創造社作家如張資平和郁達夫的文本中，「神經衰弱」、「憂鬱症」和「歇斯底里」等詞彙充斥，所描寫的男女主角往往耽溺於性放縱或性壓抑，因此處於神經崩潰邊緣。在偏愛情色描寫上，創造社可說是新感覺派如劉呐鷗、穆時英和施蛰存等的前驅。這兩派作家對這些醫學詞彙特別熟悉，並不讓人意外，因為張資平、郁達夫、劉呐鷗都曾在年少時負笈日本求學。

創造社作家的作品強烈暗示神經衰弱與縱情性慾的關連，根據中國通俗觀念，縱情性慾會導致肺結核<sup>80</sup>。舉例來說，在張資平一九二六年的小說《苔莉》中，男主角如此描述和他私通的堂兄媳婦苔莉：「她患了血斯得利病，我也患了神經衰弱症及初期的癆病了。我們兩人都為愛欲犧牲了健康。」<sup>81</sup>郁達夫

<sup>79</sup> Wiener, p. 271.

<sup>80</sup> 見 Hugh Shapiro 有關西方神經學中腦神經損傷與精子衰竭的討論。參考 Hugh Shapiro, "Neurasthenia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Nerves into China," 2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edicine (Taniguchi Foundation) on "Toward a Medical Historiography for the 21st Centur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Seoul, Korea, July 5-11, 1998。類似觀點也記載於中國醫藥文獻中。

<sup>81</sup> 張資平：《沖積期化石·飛絮·苔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頁426、429。《沖積期化石》是依照泰東書局一九二二年的第一版翻印；《飛絮》是翻印自

一九二一年的《沉淪》中，「憂鬱症」一詞反覆出現。首度在第二章出現時，加上了英文“hypochondria”作為解釋<sup>82</sup>，彷彿是如果沒有英文加持，就不足以描述男主角的心理狀況。

「憂鬱」在日文漢字發音是「ゆうつ」，如果追索字源，在古典中文裏面，通常當成動詞使用。例如《大宋宣和遺事》和《清史稿》，可見「憂鬱成病」或「憂鬱遂久病」之說<sup>83</sup>。在中國古典醫書中，「憂鬱」一詞比比皆是，總是作為動詞，通常和肺疾有關，如「憂鬱傷肺」<sup>84</sup>。「憂鬱」和字尾「症」合成一字作為疾病的名字，則是日文的創造。

當年的作家和批評家蘇雪林一九三四年如此討論郁達夫的作品：

「自我主義」(Egotism)「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和「頹廢色彩」，也是構成郁式作品的原素。……「感傷主義」也和「自我主義」一樣是近代思潮的特徵。是「世紀病」所給予現代文人的一種歇私的裏(Hysteria)的病態。……《沉淪》主人公……到日本後患上憂鬱病……《沉淪》裏主人公為了不能遏制情欲，自加戕賊，至於元氣銷沉神經衰弱，結果投海自殺……。<sup>85</sup>

對現代作家如創造社和新感覺派而言，要描述現代人的感覺、情感、精神狀態和心的疾病，不得不使用翻譯的詞彙。因此之故，當年的評論家也必須使用精神分析詞彙來討論他們的作品<sup>86</sup>。此外，這些作家的公眾形象和精神衰弱的病癥密不

---

一九二六年現代書局第一版；《苔莉》則是根據創造社一九二六年的第三版和現代書局一九三一年的第九版重印。

<sup>82</sup> 見郁達夫：《沉淪》，《郁達夫文集·第一卷·小說》（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頁21。

<sup>83</sup>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貞集，頁137；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529，頁12822。

<sup>84</sup> [清]陳夢雷纂輯：《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第4冊，卷124，頁799。

<sup>85</sup> 蘇雪林：〈郁達夫論〉，收入陳子善、王自立編：《郁達夫研究資料》（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頁66-77。原文刊載於《文藝月刊》第6卷第3期（1934年9月）。

<sup>86</sup> 石靜遠的書中有一章討論中國現代作家與精神分析的關連。她認為中國作家和精神分析的關係是創造性多於分析，因為他們試圖將理論架構納入帶有自傳色彩的文學創作中。見Jing Tsu,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67-194。

可分<sup>87</sup>。劉呐鷗一九二七年二、三月的日記中，描寫自己在上海日本人所開的品川醫院住院，治療神經衰弱症：

頭痛一半，臉上又發了二三的腫物，真是神經衰弱再來了。（二月七日）  
頭和臉腫得更利害。左眼細得難看地可憐。說是極度的神經衰弱來的偏頭痛。（二月十一日）  
私は人間嫌い自殺するかもしれない〔我討厭人，也許會自殺〕。（三月十六日）<sup>88</sup>

這豈不是在訴說，他正因「心的疾病」而飽受折磨？一九二七年七月間，他到日本訪問。芥川龍之介二十四日自殺身亡的消息，使他大受刺激，滿腦子都是自殺和瘋狂，二十五日在日記上寫道：「睡眠不足，神經跳得尖刺刺的時候，又受了一大刺戟。芥川龍之助（介）不是自殺了麼。……他是個被紳（神）經魔縛去的不幸者。……紳（神）經的尾尖是通著狂奔的大道。宇野浩二不是也發狂了麼。」<sup>89</sup>

劉呐鷗、穆時英、張資平和郁達夫的世代，必須透過譯介的知識，來嘗試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身心。換個角度看，他們的上一世代作家不也如此？今天我們更不例外。如果認為一九二〇和一九三〇年間僅有創造社和新感覺派作家因心的疾病而受苦，那麼就低估了這個現代病的普遍性。現代城市中新派男女的交際關係前所未有的，故鄉買辦婚姻傳統的束縛仍難擺脫；科舉考試的廢除，知識分子突然必須在茫茫人海中討生活；內戰、帝國主義侵略帶來的大規模流離失所等等，使得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成為精神疾病的溫床。即使如魯迅、沈從文，雖不齒創造社和新感覺派的頹廢文風，對之批判不遺餘力，卻也無法自外於神經衰弱症的影響。

魯迅早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就已記載日本醫生對他的慢性病

<sup>87</sup> Hugh Shapiro 認為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是日本人中典型神經衰弱的例子。他指出：「比起其他國家，當代中國患神經衰弱症的病人涵蓋階層更廣。在西方和日本，這種疾病有著明顯的性別和職業影響層面——年輕女性、用腦男性和『中上階級的病人』。然而中國的神經衰弱病患並未顯示這種典型的階級關連。」但我懷疑中國是例外。見 Hugh Shapiro, "Neurasthenia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Nerves into China"。關於佛洛伊德對中國現代作家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等之影響，見孫乃修：《佛洛伊德與中國現代作家》（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

<sup>88</sup> 康來新、許秦蓁合編，彭小妍、黃英哲編譯：《劉呐鷗全集·日記集》（臺南：臺南縣文化局，2001年），上冊，頁110、118、188。

<sup>89</sup> 同前註，下冊，頁472。

之診斷：「數日前患咳，疑是氣管病，上午就池田醫院（北京的日人醫院）診之，云無妨，惟神經衰弱所當理耳。」<sup>90</sup>他的作品也透露出精神失調症的魔咒如影隨形。一九一八年的《狂人日記》描述男主角因分裂的價值觀而引發了心的疾病。一九二七年的詩文集《野草》，評論家稱之為「魯迅靈魂的窗口」，其中瘋狂的敘事聲音難免讓人將敘事者等同於作者。魯迅一生不斷受到無名病痛和疾病的折磨，他的自殺衝動最近才廣為人知<sup>91</sup>。沈從文一九二九年自傳性濃厚的系列作品〈一個天才的通訊〉，描寫一個知識分子瀕臨崩潰邊緣：敘事者是一名作家，正寫信給編輯，懇求他盡快支付稿費，並抱怨長期的慢性病使他寫作時心力交瘁。偏頭痛、精神低落、不明疼痛、失眠、流鼻血、肺結核等等病痛折磨他，死刑、種族屠殺、戰爭和飢荒帶來的死亡陰影纏擾他。他想自殺也想殺人，落得憔悴蒼白，不成人形<sup>92</sup>。這篇文章寫於內戰開始後，沈從文被迫逃離北京避難到上海之時。故事處處告訴我們，敘事者／作者正苦於神經衰弱症。心的疾病和知識分子實有難解之緣，高度多愁善感的作家更容易深陷其中，無法自拔。沈從文說道：

除了住南京、住上海租界，不是全都成天可以看殺人麼？我說戰爭吧，這也是罔誕。大家從新的戰爭中過了日子多年，說這個只是無聊。我說飢荒，報紙上頭號字載得是陝西、甘肅每日餓死人兩千，可是同一張新聞上特號字登載百齡機效果，背面則「開會行禮如儀」，天下太平。<sup>93</sup>

這段話中的「百齡機」，是當年一種補藥的名字，專用來治療貧血和神經衰弱。攸關「心的疾病」的各種醫學術語，如神經衰弱和憂鬱症，到一九三〇年代已經常見於日常用語中。報紙和雜誌上，治療這類失調症的醫藥和維他命廣告充斥，五花八門。只看一九三〇年的《上海申報》，這類補藥的廣告就超過十種。八月十二日「百齡機」的廣告（圖二）<sup>94</sup>，以機器的隱喻描述人的身體。有如機器需要機油，身體也需要能量：機器蒙塵積垢時，就需要加油潤滑；憂鬱攻心時，就需要百齡機。五月十三日的報紙，可見一則「兜安氏補神藥片」的廣告，英文名

<sup>90</sup> 魯迅：《魯迅日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上卷，頁14。

<sup>91</sup> 吳海勇：《梟聲或曰花開花落兩由之：魯迅的生命哲學與決絕態度》（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

<sup>92</sup> 沈從文：〈一個天才的通信〉，《沈從文全集》第四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25-372。此作品首度出版於《紅黑》第6-7期（1929年6-7月）。

<sup>93</sup> 同前註，頁349。

<sup>94</sup> 九福公司：〈百齡機〉廣告：《上海申報》第6版，1930年8月12日。

稱是“Doan’s Nerve Tonic Tablets”。爲了推銷這種神經補藥，中文藥名使用傳統中醫概念的「補神」二字。廣告中，除了代表長壽的仙鶴和松樹及掛在樹梢上的兜安氏補神藥的藥盒之外，廣告詞還強調此藥爲萬靈丹：「此葯專治男婦神經衰弱、精力不足、神經痛、健忘、失眠、胃呆、病後體虛等症。服有奇效。而於文人學士因思慮過度，每到中年神經衰弱者，此葯尤爲絕對補神妙品，且有速效也。」（圖三）<sup>95</sup>廣告下方印著藥品公司的英文名字“Doan’s Medical Company of Western Medicine”（兜安氏西藥公司）。此公司在維多利亞時期就已存在，在英國和雪梨販售如“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腰痛補腎丸）之類藥品。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三日，雪梨出版的 *The Bulletin* 刊物中，也可看到他們的藥品廣告（圖四）<sup>96</sup>。

十一月八日的《上海申報》有一則「補爾多壽」的廣告。這也是一種補血靈藥，上面註明英文“new iron tonic”，還有德文“Blutose”的字樣。廣告詞也聲明此藥無病不治，還賣弄一個神秘兮兮的德國醫生名字：「本品爲德國休米脫柏兒博士發明之補血強精靈藥。芳香味美……專治各種血虧體弱、神經衰弱、精力不足、精神不振、腰酸脚軟、肺癆咳嗽……。」（圖五）<sup>97</sup>如此標榜德國人的發明，或許是想靠歐洲風的名字增強權威性，但此藥品事實上是日本的藤澤藥品公司所售。藤澤友吉於一八九四年於大阪創立藤澤商店，後於一九三〇至一九四三年間改名爲藤澤友吉商店。之後業務逐漸擴展至臺灣、瑞典、倫敦、美國、法國和德國<sup>98</sup>。昭和時代一張 *Blutose* 的彩色海報中，一名微笑女子手持一瓶藥水，旁邊的廣告詞寫著：「正しき補血強壯増進劑」（正牌補血健身劑）。右邊印著片假名ブルトローゼ的字樣；廣告下方印著藤澤友吉商店的名字（圖六）<sup>99</sup>。

比較上述兩種補爾多壽的廣告，可見這類治療神經衰弱的補藥在一九三〇年代已成爲中國和日本的家常用藥。這個現代病的知識透過翻譯文本和學科建制，

<sup>95</sup> 兜安氏西藥公司：〈兜安氏補神藥片〉廣告，《上海申報》第14版，1930年5月14日。

<sup>96</sup> Doan’s Medical Company of Western Medicine,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advertisement, <http://www.historypages.net/Pdoans.html#Top> (accessed May 28, 2008).

<sup>97</sup> 三昌洋行藥品部：〈補爾多壽〉廣告，《上海申報》第7版，1930年11月8日。

<sup>98</sup> アステラス製藥株式會社：《有價證券報告書》第101期，網址：[http://www.astellas.com/jp/ir/library/pdf/f\\_securities2005\\_jp.pdf](http://www.astellas.com/jp/ir/library/pdf/f_securities2005_jp.pdf)，檢索日期：2008年5月25日。

<sup>99</sup> 藤澤友吉商店：〈ブルトローゼ正しき強壯増進劑〉廣告，網址：[http://www.fukuchishoten.com/index.php?main\\_page=product\\_fukuchi\\_info&products\\_id=7469](http://www.fukuchishoten.com/index.php?main_page=product_fukuchi_info&products_id=7469)，檢索日期：2009年8月29日。



從西方傳播到日本再到中國後，診斷中國知識分子如魯迅和劉呐鷗患了「心的疾病」的，是進駐中國的日本醫師；日本人和西方人又諄諄告誡中國人：只要購買他們所出產的藥品，神經衰弱這種心的疾病，即可藥到病除。因此，這個現代病的旅行，不僅得力於透過翻譯傳播的科學知識，更透過隨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擴張而來的學科體制和商業活動。

#### 四、如何訴說「我愛你」

「蓉子，你是愛我的吧？」

「是的。」

這張「嘴」是不會說謊的，我就吻著這不說謊的嘴。

「蓉子，那些消遣品怎麼啦？」

「消遣品還不是消遣品罷哩。」

「在消遣品前面，你不也是說著愛他的話的嗎？」

……

也許她也在把我當消遣品呢，我低著腦袋。

「其實愛不愛是不用說的，只要知道對方的心就夠。我是愛你的，你相信嗎？……」<sup>100</sup>

穆時英的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中，飽受挫折的摩登青年覺得自己患了神經衰弱症。患得患失的他，給摩登女郎的花心善變弄得失魂落魄，不禁接二連三地追問她：你到底愛不愛我？你會不再愛我嗎？你會愛上別人嗎？當然，「心的疾病」主因之一，就是愛情的難以捉摸<sup>101</sup>。我們可憐的摩登青年，毋庸置疑是個善妒的情人。然而，我們此處面對的，並非傳統中國的多情書生，而是現代中國出現的新型戀人。此外，花心的摩登女郎口口聲聲掛在嘴上的「我愛你」，更非傳統中文的表達方式。五四文學以來，愛情觀突然變成一個炙手可熱的議題。李海燕二〇〇七年出版的 *Revolution of the Heart*（心的革命）一書，企圖建立中國的愛情「系譜學」，從儒家思想的「情」追溯到五四的「自由戀愛」，鋪陳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愛情觀的變化轉折。相對的，本文結論將從不同的角度檢視這個

<sup>100</sup> 穆時英：〈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頁 158。

<sup>101</sup> 從十九世紀以來，男女或同性間的愛欲是所有早期心理學書籍關注的問題，例如霽理士的《性心理學》。

議題：「我愛你」這個詞彙如何因傳教士的《聖經》翻譯而進入中國，以及日本如何在翻譯西方文本時吸納「愛」這個字眼，繼而影響五四文學裏有關愛情的論述。

翻譯的詞彙不僅轉變我們對自己和人際关系的感受，也改變了現代中國人和日本人互相表達情感的方式。沒有翻譯，日本人和中國人甚至不知如何表達「我愛你」。新教傳教士翻譯的《聖經》，我們受益良多。《聖經》裏，「愛」字作為動詞使用的例子，不勝枚舉，可用來表達神愛世人，反之亦然；還有父母親子之愛，男女情愛，朋友之愛。在〈出埃及記〉中，上帝對他的子民耳提面命：「我爺華其神、是嫉妒其神。」(I, the LORD thy God, am a jealous God)<sup>102</sup>，嚴禁世人崇拜偶像，並要求對祂絕對專一的愛<sup>103</sup>。在〈約翰福音〉中，愛字經常出現，以下段落顯示上帝如何再三要求他的子民說出愛的誓言。出版於一八一三年的《神天聖書》是第一本刊行的中文《聖經》，以文言文翻譯：

第十四章十五節 爾等若愛我則守我戒。

第十四章二十八節 爾若愛我則歡喜。

第十五章九節 如父愛我，我如是愛爾，且居于我愛也。<sup>104</sup>

最明顯的例子是第二十一章第十五到十七節，耶穌三度追問約拿的兒子：「爾愛我乎？」西門被迫三度許諾對耶穌的愛，最後覺得煩悶，回答道：「主汝無所不知，汝知我是愛爾也。」上帝如此反覆要求所愛之人對自己許諾愛情和忠貞，醋勁之大，可堪比擬世間或任何文學作品中最善妒之情人。

如果注意到張資平、郁達夫、穆時英等同時代作家的作品中明顯的基督教主題，就不致於低估基督教對五四文學中愛情論述的影響。基督教對現代日本文學的影響也昭然若揭<sup>105</sup>。雖然天主教教會中的確有《聖經》的中文翻譯在私下流

<sup>102</sup> 《聖經》中文版本眾多，早期各版本除了官話，有福州話、粵語等方言，請見 *China and Protestant Missions: A Collection of Their Earliest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ese* (Zug, Switzerland: Inter-Documentation Company, 1983-1987). Microfilm。

<sup>103</sup> *The King James Bible*：「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見中文和合本《聖經·出埃及記》，第20章，第4-6節。

<sup>104</sup>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等著：《神天聖書》，收入 *China and Protestant Missions: A Collection of their Earliest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ese* (Leiden: IDC, 1983)，微片。

<sup>105</sup> 關於基督教對五四文學的影響，見許正林：《中國現代文學與基督教》（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3年）。基督教對日本現代文學之影響，見蕭霞：《日本近代浪漫主義文學

傳，但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才有中文《聖經》發行出版，開其先河的是新教傳教士。來自蘇格蘭長老教會的牧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72-1834)，是中國第一位新教傳教士，在廣州傳教。他居住中國二十七年，首先和傳教士們擔負起全本中文《聖經》的翻譯工作。《神天聖書》於一八二三年在馬來半島的麻六甲出版發行<sup>106</sup>。英國公理會傳教士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來華十六年，與其他傳教士一起修訂當時流通的中文版《聖經》。《新約》於一八五二年在上海出版；《舊約》也隨即在一八五六年於上海發行<sup>107</sup>。馬禮遜和麥都思所編纂的字典，有助於本文的研究。

馬禮遜的《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1823) 用「愛」(粵語發音為“gae”)字來翻譯“love”<sup>108</sup>。此字典總共三部分，分成六卷，收在第二、三部分的中文條目都標有粵語發音。馬禮遜等傳教士常駐在廣州傳教，必須依賴粵語，字典是為學習粵語而編，這是合理的<sup>109</sup>。如果參考《明治のことば辭典》(明治用語辭典，1986)，我們看到「愛」字列為第一個條目，是來自中文的轉借字，從明治時期起，日本用這個字來翻譯“love”和“to love”<sup>110</sup>。根據此字典所載，末松謙澄 (1855-1922) 於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在翻譯英國通俗作家 Charlotte Mary Brame (筆名為 Bertha M. Clay, 1836-1884) 的《谷間の姫百合》(原標題為 Dora Thorne, 1877) 時，就用

---

與基督教》(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

<sup>106</sup>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1867年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本)，p. 5。

<sup>107</sup> *Ibid.*, p. 35. 麥都思與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及其他傳教士共同編修馬禮遜所翻譯的《聖經》。其他合作的傳教士有慕維廉 (William Muirhead)，艾約瑟 (Joseph Edkins) 和米憐的兒子美魏茶 (William Charles Milne)。見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關於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及在中國出版的基督新教資料，見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臺北：成文出版社，1973年影印1878年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本)，頁209-227。

<sup>108</sup>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China: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9-1823), Part III, 6: 262.

<sup>109</sup> 在中國的《聖經》譯本，除了普通話譯本，還有各種方言譯本，如寧波話、福州話、上海話、客家話、廈門話、金華話等。

<sup>110</sup> 惣郷正明：《明治のことば辭典》(東京：東京堂出版社，1998年)，頁1。首版發行於一九八六年。

「愛」這個字來翻譯“love”。他在腳註中解釋使用此字之源由：

對我來說，“love”在我們的語言中並沒有相對應的字，所以在翻譯這個字時，我用「愛」、「慕」、「戀」、「思」、「好」等字。原則上我並未依照任何成規，只是順著語氣文勢來選擇適合的字來翻譯。“To Like”這個字沒有“to love”那麼強烈。因為很難找到合適的字來突顯其中程度上的輕重差異，以致於這兩個字的翻譯常常混淆不清。所以我別無他法，只好提出「愛」這個字。<sup>111</sup>

此處我們看見譯者在跨越語言文化界限時，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高度自覺，並且反覆權衡各種可能對譯的字眼，就為了恰當地翻譯一個字。這就是能動性(agency)所在：爲了要選擇最正確的字彙（如果可能「正確」的話）來翻譯所要傳達的知識或感受，譯者必須竭盡他的語言能力，來找出一個他覺得最適合的字。在此例中，中國古文中的「愛」是末松謙澄認爲最接近英文的“love”。

據我所知，在麥都思的《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47-1878)中，“to love tenderly”的項下，“to love”首度被譯成「戀愛」（廣東話唸成 *lwân gnaé*）。在“to love”這個條目下，粵語相對應的詞語有“gnaé”（普通話發音爲「愛」），“haóu”，（普通話爲「好」，意爲「偏好」），“pung”（「寵溺」，普通話「捧在掌心」的「捧」字可勉強對應），“teih teih”（「疼惜」）等等<sup>112</sup>。當中村正直(1832-1891)於一八七〇年將山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的《西國立志編》(*Self-Help*, 1859)譯介到日本時，“love”首度翻譯爲「戀愛」（れんあい）。中村把這個辭彙當動詞使用，但後來變成名詞<sup>113</sup>。根據柳父章的研究，中村很可能從麥都思的字典中學到這個辭彙，當時在日本這部字典是廣爲人知的<sup>114</sup>。《女學雜誌》的編輯巖本善治一八九〇年在一本翻譯小說的書評中指出：「戀」（こい）一字來自日本庶民的粗俗用語，但「戀愛」（れんあい）兩字合用時，就變純淨了：

譯者〔以「戀愛」一詞〕純淨且正確地傳達了“love”的感覺，同時，充滿

<sup>111</sup> 同前註，頁3。

<sup>112</sup> W. H. Medhurst, Se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7-1848), 2: 808.

<sup>113</sup> *Ibid.*, p. 602。關於中村正直在明治日本倡導基督教的故事，見 A. Hamish Ion, “Edward Warren Clark and Early Meiji Japan: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Contact,”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11.4 (1977): 557-572。

<sup>114</sup> 柳父章：《愛》（東京：三省堂，2001年），頁52。

不潔暗示的日本俗字〔戀〕在這種巧妙的運用中，也變得純淨了。<sup>115</sup>

北村透谷(1868-1894)於一八九二年在《女學雜誌》中發表一篇題名為〈厭世詩家與女性〉的文章，開頭就寫道：「戀愛是人生的秘鑰——有戀愛就有來生，沒有戀愛的人生毫無色彩。」<sup>116</sup>如眾所周知，這篇著名的文章昭示著日本浪漫時期的來臨。柳父章的《愛》一書追溯「愛」的字源和演變：希臘哲學家闡釋的“eros”（男女之愛）及“agape”（神對人之愛）；基督教拉丁文經典所翻譯的“caritas”及“cupiditas”；十二世紀南法吟遊詩人所歌詠的“amour”（男女之愛昇華為神聖之愛）混合了“eros”及“agape”的意義；到宗教改革後德文“liebe”及英文“love”的翻譯；一直到譯介為中國和日本的「愛」。提到其語意在歷史上數度變遷，他說道：「其實是翻譯語的問題。」（問題は翻訳語だ）<sup>117</sup>

我們探討中國「愛」的概念演變時，如果忽略了鄰近的日本同時期的發展，眼界將大受限制。五四的文學革命時期盛行的「戀愛+革命」小說，在大正時期的日本早已是一種重要的文類，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如大杉榮，正提倡「自由戀愛」作為抵抗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我在其他文章中提過，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如劉師培(1884-1919)和張繼(1882-1947)於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在東京求學並參與無政府運動期間，曾追隨大杉榮學習世界語<sup>118</sup>。討論「戀愛+革命」和中國「情」的傳統的對照關係，意義不大；關鍵是「情」自晚明以降歷經數百年的傳統論述，在近現代幾近一夕蛻變的原因。如果李海燕探討這個概念時，能夠探討它如何從西方飄洋過海到晚清和五四中國，並能把日本——我們的文化分身——納入考量範圍，她的《心的革命》一書將更令人信服，也更具啟發性<sup>119</sup>。如果她讓「愛」的系譜學跨越中國和日本的國家和語言界限，她的書可能相當令人驚豔。

據柳父章所言，奈良末期的詩歌集《萬葉集》(625-750s)中，「愛」轉借自中國古文，而戀(こい)則是日本本土語言——「大和言葉」。他指出，「愛」一字只出現在闡述佛教教誨的題詞中，但從未出現在以本土日語所寫的歌謠中。

<sup>115</sup> 同前註，頁 53。

<sup>116</sup> 同前註，頁 54。

<sup>117</sup> 同前註，頁 41。

<sup>118</sup> Peng Hsiao-yen, “A Traveling Text: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Japanese Anarchism, and Shanghai Neo-Sensationism,” pp. 1-42.

<sup>119</sup>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和「愛」相對應的日文字則是「おもほゆ」和「しぬばゆ」<sup>120</sup>。但柳父章指出「戀愛」中的「戀」是本土日語，這種說法令人懷疑。我同意，「戀」以平假名書寫成「こい」時是大和言葉。但是「戀愛」兩字連用時，發音是中文的音讀而非日文的訓讀<sup>121</sup>，因此可以判定是中國的「戀」和「愛」兩字的並用。此二字在古典中文中大量使用。舉例來說，班固(32-92 A.D.)《漢書》中的〈張騫傳〉中，「戀」和「愛」就頻頻出現，如「蠻夷戀故地」、「蠻夷愛之」、「單于愛養之」<sup>122</sup>。「戀」和「愛」最初都是書面語而非口語。近十個世紀之後的宋詞中，「戀」一字已近乎口語。如黃庭堅(1045-1105)詞曰：「怨你又戀你。恨你惜你。畢竟教人怎生是。」<sup>123</sup>但「戀你」這個用法並未傳世。

如同今天的我們，生於古代中國或明治日本之前的人，當然知道如何去愛。宋代女詞人魏夫人(1040-1103)寫過一闕詞，其中的女性敘事者，因所愛之人睽違日久，哀怨之情溢於言表。結尾的一段，就古典詩詞標準而言，相當露骨：「我恨你，我憶你，你爭知？」<sup>124</sup>她心心念念想說的是「我愛你」，但卻苦於說不出口。

十一世紀魏夫人說不出口的關鍵話語，到十九世紀初因傳教士的中文《聖經》翻譯而變為可能。當時中國人面臨創造新白話文的危機，透過文化翻譯，學習到如何表達內心的欲望，就如同學習為心的疾病命名一樣；這是一種「學來」的現代病和感受。穆時英故事中摩登男女的言談，任意夾雜東西方辭彙，醫學名詞信手拈來，處處顯示他們所表現的情感，充其量是現代版的「為賦新詞強說愁」；更重要的是，展現了現代化進程中科學知識的通俗化。透過小說，我們看見新感覺派作家巧妙地將語言實驗、文學批評及科學知識評論融為一爐，充分展現跨文化現代性的精髓。他們的作品不但彰顯並嘲諷了當下東西方話語的混雜，

<sup>120</sup> 柳父章：《愛》，頁69。

<sup>121</sup> 參考長戶宏：《大和言葉を忘れた日本人》（東京：明石書店，2002年），頁159-204。作者企圖釐清在漢字傳入日本之前，日本本土語言的歷史。有韓國學者主張日本本土語言和古代韓語有關連，參考朴炳植：《大和言葉の起源と古代朝鮮語》（東京：成甲書店，1986年）。有關荻生徂徠批判以訓讀法學習中文的缺點，參考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頁71-100。

<sup>122</sup>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61〈張騫李廣利傳〉，頁2692、2689、2692。

<sup>123</sup> [宋]黃庭堅：〈歸田樂引〉，見唐圭璋編輯：《全宋詞》（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卷1，頁407。

<sup>124</sup> [宋]魏夫人：〈繫裙腰〉，同前註，卷1，頁269-270。

諧擬的語氣顯現出他們在追求西方現代性的過程中，反覆檢視西方和自我的類比和差異。在東西方接觸的當下，他們透過「取捨折衷」，自覺地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不但創新了文學語言、日常語言，也形塑了我們的自我認知和對彼此、對世界的認知。

本文標舉「一個旅行的疾病」，委婉指出科學術語和情感表達的越界旅行過程，目的是嘗試定義：何謂跨文化現代性？晚近的跨文化 (transculturation) 研究，常以表演性 (performativity) 作為隱喻，例如黛安娜·泰勒 (Diana Taylor) 的著作 *The Archive and the Repertoire*。泰勒描述一齣劇本中的女性角色 Intermediary，是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混種後裔。劇中她的身體和心靈形成文化記憶銘刻的場域，各式各樣的聲音、語言、論述在此場域中匯流又流出。根據泰勒的分析，在此文化匯流的過程中，劇中角色有如空虛的容器一般，五花八門的訊息可以自由流進又流出<sup>125</sup>。穆時英的摩登男女也是這類缺乏自主意識的故事角色，他們的身心就是文化匯流的場域，隨著銘刻了文化記憶、不斷前行之潮流載浮載沉。

這種隱喻固然迷人，但本文所著重的是在此跨文化場域中展開積極作為的演員，他們在文化中介或文化夾縫中找到創造性轉化的空間。在此空間中，意義、意圖和言語不斷流動變化，是從事文化翻譯者——翻譯家、藝術家、思想家、作家和知識分子等等——所致力場域。換句話說，文化翻譯者與其比擬為一個故事中的角色，不如比擬成在跨文化場域中從事表演的演員。因此，我所謂的跨文化現代性，所凸顯的是演員的心態，而非劇中角色。跨文化場域就是現代性發生的空間，而這些演員的能動性，突破了不同文化的體制實踐的疆界。當然，他們有如劇中角色，身體和心靈形成文化記憶銘刻的場域，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將接收到的訊息，自覺地以本國觀眾能理解的方式轉譯出去。這不僅使外來語言和概念產生蛻變，更改變了本土語言和感覺、思考的模式；他們是現代性的推手。他們不僅是泰勒描述的「資訊網絡中的受話者／傳話者」，而是進一步在此網絡中找到「創新的能動性」(an agency of initiation)，如同荷米·巴巴 (Homi Bhabha) 在 *Location of Culture* 一書中討論少數族裔挑戰主流文化時所指出<sup>126</sup>，這也是茱蒂斯·巴特勒 (Judith

<sup>125</sup> Diana Taylor, *The Archive and the Repertoire: Performing Cultural Memory in the America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79-86.

<sup>126</sup> Homi Bhabha,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235.

Butler) 所說的「展演的能動性」(a performative agency)<sup>127</sup>。對於巴巴來說，能動性的開創，總是發生在弱勢挑戰主流的不對等立場中<sup>128</sup>。人的活動處處受體制所限，毋庸置疑。無意識的芸芸衆生，只能在各種聲音論述中渾渾噩噩、隨波逐流；相對的，能超越體制限制者則鶴立於群。現代中國和日本接收西方知識的強勢輸入時，文化翻譯者發揮個人介入和體制實踐之間的折衝平衡工夫，不斷地挑戰外來體制及傳統體制實踐的界限。他們是福科筆下的現代性推手，總是身處疆界、挑戰界限，擔負起「當下的發揚光大」(heroization of the present) 之任務。他們是創造趨勢的前行者。

---

<sup>127</sup> Cf. Judith Butler, "Preface (1999)" in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xxv: "In this text as elsewhere I have tried to understand what political agency might be, given that it cannot be isolated from the dynamics of power from which it is wrought. The iterability of performativity is a theory of agency, one that cannot disavow power as the condition of its own possibility."


<sup>128</sup> Bhabha, p. 231: "For what is at issue in the discourse of minorities is the creation of agency through incommensurable (not simply multiple) positions."



comforty <sub>一致</sub> with the <sub>與</sub>  
 ontological and <sub>理</sub> <sub>學</sub>  
 psychological laws <sub>性</sub> <sub>理</sub> <sub>學</sub> <sub>理</sub>

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  
 小人不知天俛而不畏  
 及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敬神道他化畏一字而已  
 佛人倫之序

圖一：西周手跡

<p><b>六十種功效</b></p> <p>補壯保補潤利健開        血腎肺腦腸尿脾胃        返增強白養強生平        老加壯潤心筋精肝        還體肌皮清因益順        直重肉膚血骨髓氣</p>	<p><b>百齡機說明</b></p> <p>有人體外具五官四肢內藏百骸。動脈須通。息相連。體發。各        缺。須用熱力。宛然一器也。百骸。動脈。須通。息相連。體發。各        以。灰。塵。之。力。則。力。積。之。久。則。生。鏽。惟。是。則。滯。而。不。動。各        慮。油。水。之。力。則。力。積。之。久。則。生。鏽。惟。是。則。滯。而。不。動。各        有。鐵。骨。之。力。則。力。積。之。久。則。生。鏽。惟。是。則。滯。而。不。動。各        有。筋。力。之。力。則。力。積。之。久。則。生。鏽。惟。是。則。滯。而。不。動。各        不。宜。筋。力。之。力。則。力。積。之。久。則。生。鏽。惟。是。則。滯。而。不。動。各        失。宜。筋。力。之。力。則。力。積。之。久。則。生。鏽。惟。是。則。滯。而。不。動。各        不。宜。筋。力。之。力。則。力。積。之。久。則。生。鏽。惟。是。則。滯。而。不。動。各        考。得。其。不。宜。筋。力。之。力。則。力。積。之。久。則。生。鏽。惟。是。則。滯。而。不。動。各        除。每。日。滋。補。重。在。咽。之。未。力。之。隨。妨。強。壯。無。病。入。藥。統。治。保        至。老。不。足。為。奇。也。如。年。無。病。入。藥。統。治。保        亦。老。不。足。為。奇。也。如。年。無。病。入。藥。統。治。保</p>	
---	---	--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 各埠  
 中法藥房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上海白克路十四號  
**九福公司發行**  
 分公司 濟南 天津 遼寧 石叻

圖二：〈百齡機〉廣告

此藥專治男婦神經衰弱精力不足神經痛  
健忘失眠胃呆病後體虛等症服有奇效而

兜安氏補神藥片

於文人學士因思慮過度屢到中年神經衰  
弱者此藥尤為絕對補神妙品且有速效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江西路一十七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告白

DOAN'S NERVE TONIC TABLETS  
兜安氏補神藥片

此藥專治男婦神經衰弱精力不足神經痛  
健忘失眠胃呆病後體虛等症服有奇效而

於文人學士因思慮過度屢到中年神經衰  
弱者此藥尤為絕對補神妙品且有速效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江西路一十七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告白

圖三：〈兜安氏補神藥片〉廣告

# STRAIGHT TALK

BY SYDNEY PEOPLE

ABOUT

.. DOAN'S ..

## Backache Kidney Pills.



*Heard in Trains, Buses—Everywhere and Always—DOAN'S.*

When incidents like the following occur here in Sydney, and Sydney men and Sydney women relate their experiences in a Sydney paper for the benefit of Sydney people, the genuineness of the statements cannot be doubted. They have the ring of truth about them that there is no getting away from.

圖四：“Backache Kidney Pills” advertisement.

滋補 聖品



# BLUTOSE

NEW IRON TONIC

全球馳名

補血 強精

補爾多壽



大瓶可服一個月上 小瓶可服半個月以上

上海經銷處：中國、中西、大藥房、各埠

多一即能轉弱為強 身體壯健 百病不生

本品為德國休米脫伯兒博士發明之補血強精藥 香味質料濃厚 曾經中外各國醫師實驗證明效力確在各 種補劑之上 專治各種血虧 弱症 神經衰弱 精力不足 精神 不振 腰酸 四肢軟弱 咳嗽 痰喘 病後 身體久不復原 一服 一瓶 藥

1919. 116 號

上海四川路郵政總局對面 三昌洋行藥部

圖五：〈補爾多壽〉廣告



圖六：〈フルトゼ正しき強壯増進劑〉廣告

# 一個旅行的現代病

## ——「心的疾病」、科學術語與新感覺派

彭小妍

穆時英一九三三年的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用了許多科學術語。醫學和心理學辭彙，例如「女性嫌惡症」、「解剖」、「神經衰弱」、「消化不良」、「病菌」等等，充斥全篇。這些辭彙轉借自日文翻譯西方科學的術語，作者輕佻地運用這些辭彙，嘲弄敘事者為追求摩登女郎而神魂顛倒，展現出新感覺派作品的一貫作風。這些轉借字不僅促成中國現代文學辭彙的蛻變，也轉化了我們的日常語言——例如日常會話、報紙、教科書等等——制約了我們了解自己和他人身體與心理的模式。

本文將追溯心理學如何進入日本與中國，並以幾個關鍵辭彙的翻譯為例，說明我們是透過翻譯，而學習如何為五官感受和心理疾病命名。如眾所皆知，晚清以來盛行「東亞病夫」的說法。二、三〇年代的作家是在告訴我們：如今使國人深受其苦的是「心的疾病」。結論將進一步說明，連今天我們對彼此示愛的「我愛你」一詞，也是現代的發明，受到基督教翻譯《聖經》和日文轉借字的影響。

在理論上，本文探討翻譯過程中，知識／權力與譯者的能動性、創造性的關係：在文化翻譯的過程中，面對各種「體制實踐」的交會——如儒學、佛學、傳統醫學與西學之交會——譯者如何「取捨折衷」（井上哲次郎語），透過「個人自由抉擇」來跨越體制實踐的界限，進而創新。本文指出，「心的疾病」的旅行過程，讓我們理解到，國家、語言的界限，無從阻礙概念、語彙的全球性流動；此過程中，文化翻譯者的能動性是跨文化現代性的推手；跨文化的場域是他們施展創造性轉化的空間。

關鍵字：轉借字 能動性 體制實踐 個人自由選擇 跨文化現代性

## A Traveling Malady—The “Malady of the Heart,” Scientific Terminology, and the Neo-Sensation School

PENG Hsiao-yen

In Mu Shiyang’s 1933 story “Bei dangzuo xiaoqianpin de nanzi” (“A Man Taken as a Plaything”), 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terms such as “misogyny,” “autopsy,” “neurasthenia,” “indigestion,” and “germ” abound. Typical of Neo-Sensation stories, these terms, borrowed from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Western scientific lexicon, are used in a flippant fashion to ridicule a fickle modern girl who enjoys torturing her suitors. My ultimate goal is to indicate that loanwords from modern Japanese scientific terminology transformed not only the lexic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that of our everyday language—in speech, newspapers, textbooks, and so on—conditioning the way we understand our own bodies and minds as well as others’.

This article first traces the introduction of psychology as a discipline in Japan and China, using the translation of a few key terms as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that it is through translation that we learn to name our perceptions and mental illnesses. After the discourse of the “Sick Man of East Asia” (*dongya bingfu*), prevalent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Qing, writer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ere telling us that Chinese were now suffering from the “malady of the heart.” In the conclusion I will show that even the term “I love you” is also a modern invention, influenced by the translation of Christian scriptures and Japanese loanword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knowledge/power and the translator’s agency and creativ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facing the interactions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practices—Confucianism, Buddhism,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al science—how does the translator practice the art of “selection, deletion, and compromise” (Inoue tetsujirō)? It is through “individual free choice” that the translator manages to 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in order to create. The article aims to point out that the traveling process of “the malady of the heart” shows tha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nations and languages are unable to block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new terms and concept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translators’ agency is the propeller of transcultural modernity; the transcultural site is the space where the translators exercise transcultur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loanwords    agency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individual free choice  
transcultural modernity

## 徵引書目

- 丁福保、華文祺：《神經衰弱三大研究》，上海：醫學書局，1910年。
- 九福公司：〈百齡機〉廣告，《上海申報》第6版，1930年8月12日。
- 三昌洋行藥品部：〈補爾多壽〉廣告，《上海申報》第7版，1930年11月8日。
- 王國維：《心理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
- 王羲和：《神經衰弱自療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
- 朱光潛：〈福魯德的隱意識說與心理分析〉，《東方雜誌》第18卷第14期，1921年7月，頁41-51。
- 朱櫛等編：《普濟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
- 李東垣著，丁光迪、文魁編校：《東垣醫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年。
- 郁達夫：《沉淪》，《郁達夫文集·第一卷·小說》，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
-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
- 周作人：《雨天的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_\_\_\_\_：《永日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_\_\_\_\_：《知堂回想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約瑟海文 (Joseph Haven)，顏永京譯：《心靈書》，上海：益智書會，1889年。
- 吳海勇：《梟聲或曰花開花落兩由之：魯迅的生命哲學與決絕態度》，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
- 孫乃修：《佛洛伊德與中國現代作家》，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
-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等著：《神天聖書》，收入 *China and Protestant Missions: A Collection of their Earliest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ese*，1813年。Leiden: IDC, 1983，微片。
- 陳大齊：《心理學大綱》，北京：北京大學編譯會，1921年。
- 陳夢雷纂輯：《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
- 兜安氏西葯公司：〈兜安氏補神藥片〉廣告，《上海申報》第14版，1930年5月14日。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唐圭璋編輯：《全宋詞》，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
- 高覺敷編：《中國心理學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 許正林：《中國現代文學與基督教》，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3年。
- 康來新、許秦蓁合編，彭小妍、黃英哲編譯：《劉訥鷗全集·日記集》，臺南：臺南縣文化局，2001年。
- 凱博文著，郭金華譯：《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現代中國的抑鬱、神經衰弱和病痛》，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 張資平：《沖積期化石·飛絮·苔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
- 馮夢龍：《警世通言》，臺北：里仁書局，1991年。



- 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彭小妍：《海上說情慾：從張資平到劉吶鷗》，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
-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費孝通：〈重刊潘光旦譯注靄理士《性心理學》書後〉，收入靄理士著，潘光旦譯注：《性心理學》，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
-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
- 劉紀蕙：〈壓抑與復返：精神分析論述與現代主義的關聯〉，《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4卷第2期，2001年1月，頁31-61。
- 潘光旦：〈馮小青考〉，《婦女雜誌》，第10卷第11期，1924年11月，頁1706-1717。
- \_\_\_\_\_：《潘光旦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 魯迅：《魯迅日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 樂齊主編：《中國新感覺派聖手：穆時英小說全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年。
- 蕭霞：《日本近代浪漫主義文學與基督教》，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
- 盧壽籤：《神經衰弱療養法》，上海：中華書局，1917年。
- 蘇雪林：〈郁達夫論〉，收入陳子善、王自立編：《郁達夫研究資料》，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
- 靄理士著，潘光旦譯注：《性心理學》，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
- Y：〈佛洛特新心理學之一班〉，《東方雜誌》第17卷第22期，1920年11月25日，頁85-86。
- 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
- 大瀨甚太郎：《心理撮要》，東京：成美堂書店，1914年。
- 三浦謹之助：《神經病診斷表》，東京：三浦謹之助，1894年。
- 井上正賀：《神經衰弱營養療法》，東京：大學館，1915年。
- 井上哲次郎：《釋迦牟尼傳》，東京：文明堂，1903年。
- \_\_\_\_\_譯：《心理新說》，東京：青木輔清，1982年。
- 中島力造編：《心理撮要》，東京：普及舍，1898年。
- 田村化三郎：《神經衰弱根治法》，東京：健友社，1911年。
- 朴炳植：《大和言葉の起源と古代朝鮮語》，東京：成甲書店，1986年。
- 安田德太郎：《精神分析入門》，東京：アルス，1928年。
- 西周譯：《心理學》，東京：文部省，1875-1876年。
- 阿部洋：《中國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東京：福村出版，1990年。
- 佐藤達哉：《日本における心理學の受容と展開》，京都：北大路書房，2002年。
- 長戶宏：《大和言葉を忘れた日本人》，東京：明石書店，2002年。
- 柳父章：《愛》，東京：三省堂，2001年。
- 惣郷正明：《明治のことば辭典》，東京：東京堂出版社，1998年。

- 藤澤友吉商店：〈ブルトローゼ正しき強壯増進劑〉廣告，[http://www.fukuchishoten.com/index.php?main\\_page=product\\_fukuchi\\_info&products\\_id=7469](http://www.fukuchishoten.com/index.php?main_page=product_fukuchi_info&products_id=7469)，檢索日期：2009年8月29日。
- 鷲尾浩：《性の心理・第一卷・人間の性的選擇（上）》，東京：冬夏社，1921年。
- アステラス製藥株式會社：《有價證券報告書》第101期，網址：[http://www.astellas.com/jp/ir/library/pdf/f\\_securities2005\\_jp.pdf](http://www.astellas.com/jp/ir/library/pdf/f_securities2005_jp.pdf)，檢索日期2008年5月25日。
- Asad, Talal.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 James Clifford and Marcu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Bain, Alexander. *Mental Science: A Compendium of Psych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Designed as a Text-Book for High-Schools and Colleges*.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868.
- Beard, George et al. *Sexual Neurasthenia: Its Hygiene, Causes, Symptoms and Treatment: with a Chapter on Diet for the Nervous*. Ed. with a preface by A. D. Rockwell. New York: Arno Press and the New York Times, 1972.
- \_\_\_\_\_. "Neurasthenia, or Nervous Exhaustion." *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3 (1869): 217-221.
- Bhabha, Homi.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China and Protestant Missions: A Collection of their Earliest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ese*. Zug, Switzerland: Inter-Documentation Company, 1983-1987. Microfilm.
- Chung, Juliette Yueh-tsen. "Eugenics and the Coinage of Scientific Terminology in Meiji Japan and China." In *Late Qing China and Meiji Japan: Political & Cultural Aspects*. Ed. Joshua A. Fogel. Norwalk: EastBridge, 2004.
- Doan's Medical Company of Westen Medicine,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advertisement, <http://www.historypages.net/Pdoans.html#Top> (accessed May 28, 2008).
- Ellis, Havelock. *Sexual Selection in Man*. Vol. 4 of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6-1942.
- \_\_\_\_\_.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 1905-1928.
- Foucault, Michel.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 Paris: Gallimard, 2001.
- Gijswijt-Hofstra, Marijke and Roy Porter, eds. *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 Amsterdam and New York: Editions Rodopi B. V., 2001.
- Harrell, Paula. "Guiding Hand: Hattori Unokichi in Beijing." *Asia for the Asians: Japanese Advisors in China*. Forthcoming. Available from <http://www.chinajapan.org/articles/11.1/11.1harrell13-20.pdf> (accessed January 2, 2009).
- Heinrich, Larissa N.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Ion, A. Hamish. "Edward Warren Clark and Early Meiji Japan: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Contact."

- Modern Asian Studies* 11.4 (1977): 557-572.
- Kaske, Elisabeth. "Cultural Identity, Education, and Language Politics in China and Japan, 1870-1920."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in Global Context*. Eds. David L. Hoyt and Karen Oslund.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6.
- Kleinman, Arthur. *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Ladd, George Trumbull. *Outlines of Descriptive Psychology: A Text-Book of Mental Science for Colleges and Normal Schools*. New York: Scribner, 1898.
- Lee, Haiyan.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iu, Lydia.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Lowndes, Mary E. Trans. *Outlines of Psycholog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1.
- Masini, Federic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Macao, China: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9-1823.
- Pearson, Veronica. *Mental Health Care in China: State Polici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London: Gaskell, 1995.
- Peng, Hsiao-yen. "A Traveling Text: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Japanese Anarchism, and Shanghai Neo-Sensationism." *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7 (June, 2007): 1-42.
- \_\_\_\_\_. "Sex Histories: Pornography or Sexology? Zhang Jingsheng's Sexual Revolution." In *Feminism/Feminin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Ed. Peng-hsiang Chen and Whitney Crothers Dilley. Vol. 18. Amsterdam and New York: Editions Rodopi B. V., 2002.
-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臺北：成文出版社，1973年。
- Sen, W. H.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7-1848.
- Shapiro, Hugh. "Neurasthenia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Nerves into China."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History of Medicin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June 16-18, 2000.
- Sunquist, Scott, ed. *A Dictionary of Asian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1.
- Taylor, Diana. *The Archive and the Repertoire: Performing Cultural Memory in the America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Hurley, Robert et al, trans.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Ed. Paul Rabinow. London: Allen Lane, 1997.
- Tsu, Jing.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Wiener, Philip. "G. M. Beard and Freud on 'American Nervousnes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7. 2 (April 1956): 269-274.
- Wylie,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 Zhang, Jingyuan. *Psychoanalysis in China: Literary Transformations, 1919-1949*. Ithaca: East Asian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2.
- Zhang, Yingjin. "The Haipai Controversy." In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Configurations of Space, Time, and Gen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